

今天 2014年春季号 总 104 期

## 目 录

### 视野：张承志特别专辑

编成小引  
张承志

第一部分 蒙古  
二十八年的额吉

第二部分 新疆  
面纱随笔  
鱼游小巷  
心的新疆  
陶醉的鸭儿看  
树梢上的心  
双联璧

第三部分 穆斯林  
旱海里的鱼  
以《心灵史》收藏纪念版收益捐助巴勒斯坦难民决行记录  
越过死海

第四部分 西班牙  
把心撕碎了唱

第五部分 日本  
赤军的女儿（节选）  
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

第六部分 世界  
地中海边界  
投石的诉说  
看那头不屈的雄狮  
献给你的都瓦  
世界与我们的学术

第七部分 祖国  
四十年的卢沟桥  
磨坊目击记

大国的诅咒

### 《今天》诗人推荐

木寻诗选

### 蒋一谈小说集

芭比娃娃

地道战

发生

跑步

一张与众不同的脸  
——蒋一谈 VS 杨庆祥

### 伊夫·博纳富瓦作品辑

伊夫·博纳富瓦诗选

论保罗·策兰  
伊夫·博纳富瓦

“可辨听的另一种语言”  
陈力川

### 长诗

潘家园旧货市场玄思录  
西川

### 对话录

上帝真的存在吗？  
——依兰·斯塔文斯 VS 小海

## 今天艺术

关于日常生活的影像  
——看苏文的《北京银矿》  
大门（章翔鸥）

影像收藏与现实种种  
——苏文 VS 鲍昆

## 编成小引

此次编为一个小辑的文章，循着一个自我解说的思路：

对我来说，自己的步履体验和影响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及自己想究明索求的领域大约有五个，它们也是这小辑的前五部分：蒙古（1）、新疆（2）、黄土高原（3）、西班牙（4）、日本（5）。与这些不同文化的关系，因介入方式与深度的不同当然有深浅优劣的差异，外在的语言也各有不同相貌。但前三者如过去常被形容的乃是我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后二者则日益成为自己看待世界史（6）和中国（7）的眼光。

这一切又都能追溯到一个沉重的开始。于是关于革命的内省，就成了一种缘起、动力、与注释。我坚信“他者”的观点，将愈来愈成为人类思想的焦点；而在内蒙古草原萌芽进而在“心的新疆”养成的他者立场，改变了我自己。

文章堆砌已经很多，不宜编后再添饶舌。但藏有共感的人也许会发现：这里提出的，是一份几乎与各种知识分子言行都在分庭抗礼的异议与挑战。这里在强调——文学中的艺术、语言中的诗性，早晚都要迎面人的原则的审视。而所谓人道主义，在这个无耻的二十一世纪，其实就是对正遭受着全球围剿的无辜他者的态度。

编后，浏览日本诗人谷川雁的句子若有所思。他的诗行里提及，在这个“一边活着一边被杀死”的时代，有一种“与大众和知识人都尖锐对立”而且“从哪里都没有接受援助的可能的游击队”。我喜欢这个表达。是的，文明浸透的游击队，“拒绝知识分子的翻译法”。

张承志

2014年3月19日

## 第一部分 蒙古

### 二十八年的额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到。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艾洛华哥

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对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做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sup>1</sup>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

<sup>1</sup> 百拉提月，指伊斯兰教历的八月，在这个月里，家家念诵忏悔词，准备即将到临的斋月。

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在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艾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偏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辞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艾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我问，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总之他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

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意。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一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艾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sup>2</sup>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sup>3</sup>领着一群骡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艾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呵，你使我复杂了。

### （三）

幸亏我把她和艾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朦，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多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艾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她不敢关掉煤气。80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溶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

<sup>2</sup> 指小说《黑骏马》里养活暴风雪后孤儿马驹的情节。

<sup>3</sup> 儿马，即种马。



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艾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呵！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登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的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扑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jesen hū，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辞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做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蝇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一首《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夜星点缀的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渡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自一九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所谓国际通用的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听过的一句费解的话：“这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sup>4</sup>，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又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

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 jur γ an-u saran-u gegen tang-ās oroju irele  
Alhun alhun tan-u aisui jam-du ösün boiji γ san bi mǎ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 naiman jil-ün nutug-tu mori mini jo γ sǒd yabuhu ügei  
Hücin-iyān emüsügen ta bol a γ u ton-u dǒtura 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者的数中

Culütai obō-yin dō γ ur bol angkan-u Gúngse mǎn  
Cima-yi amujǘlsan Súme nada-du sayihan ó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 edür-tü hola-yi harād dabhur dabhur ūl  
Halūn cejin-ü dotor-ās jöhen uilaju 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1996年7月腹稿于内蒙  
1998年4月写成于北京

---

<sup>4</sup> 这句话，是已故的村上正二教授告诉我的一句据说是蒙古学家田清波提出的论断。

## 第四部分 西班牙

### 把心撕碎了唱

——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之一

它可不是几支村歌野曲，一角遗风艳俗。弗拉门戈——它高贵地昂着头，更高傲地冷面俯视。它虽然流行于底层，却是一个绅士淑女津津乐道的领域。比如日本人对它很有兴趣，处处有学习弗拉门戈的俱乐部。它是一个国际瞩目领域，多少专家以捉摸它为业，大部头的著作汗牛充栋。

其实无论谁写，都是那么一些事儿。但它的特点就是酷似魔法，能在不觉之间引着描写它者走上岔路。由于受它吸引，我曾如饥似渴地去书里寻找答案，但读了一批名著后，我还是感到涉及安达卢西亚的诸大作家在面对它时，都好像突不破隔着的一道纱幕，说不清弗拉门戈的究竟。

——写着写着，他们就描画起一个耸着肩膀敲踏地板的黑衣女人。在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住在窑洞里的吉普赛人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剧团。脸庞消瘦的女人转动裙子、硬鞋根踏出清脆的雨点。但是，弗拉门戈是一种民俗舞吗？

我自己更是提笔之前已经不抱希望。甚至我连阿尔巴辛窑洞里那种供应旅游客的演出都没看过。但对这个题目的不能割爱，并不是说我没有不妙的预感；我抚着键盘，一阵阵觉得说不清道不明，好像刚达斡尔（歌手）在开场之前已经声嘶力竭。

远处它的影子，呈着暧昧的黑色。

弗拉门戈，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都被你迷住了，而你却端着架子，神情严峻。一般说来它可能可以算是一种歌，或者算是一种歌舞演奏。但这么说又显然不准确。有人把它划为无形文化；但是除了西班牙，全欧洲的艺术里都不见这一门类。我一开始就抱着异端的挑剔思路，我感觉它来历复杂，没准它起源于某种宗教仪式。

我说不清，但是我感到自己一直追逐着它的影子。

描写这个影子不是一件易事。有关它的资料似乎被故意搅乱了，对它的体会也难以名状。我已经多次这么感叹——显然，文字无法对付这一类感受。

#### 1, baile (舞)

第一次接触它是在日本。

那次一个教授款待我去箱根。在小涌园的旅馆里，消磨时间的客人人声鼎沸，一桌桌正谈得火热。我突然看见桌前有一个全身黑色的女人，在为晚餐的客人独舞助兴。教授告诉我，这是西班牙舞。我不觉看得入了神，但那时我不知道这是一场弗拉门戈。那个女人并非美女且人在中年，但她瘦且苗条、硬肩细臂的姿态，却如磁石般引人。

小涌园是一家著名旅馆，连中餐厅厨师都聘自北京钓鱼台。客人五光十色，

有一个兴起离桌，搂着女伴，扭起在日本罕见的“但斯”。多数的客人边饮边谈，顺便瞟过一眼，看看助兴的西班牙舞。

非常巧，她们演出的空场，就在我们那张桌子旁边。本来我有不少事要和教授谈，本来我曾想获得一次休息；但是她却成了那一夜、成了箱根的全部记忆。

她的黑裙离我非常近，我一直看着她刀削般的脸庞，还有她低垂着的眼皮。当她激烈地舞着，时而靠近我时，她正急促地呼吸，一股气息逼人而来。也许因为她是在为一群动物般的富人伴舞，我觉得我嗅到了她正压制着的愤怒。但那舞蹈恰好是无表情或者表情严肃的，所以她很容易掩饰自己。而我被这种神色震慑，或者说被吸引——我感到了强大的魅力。她脸上刀砍般的轮廓里满是沧桑，与她苗条的姿影相反相悖。依稀记得一群男子在稍离几步的地方伴奏；可能那儿有一个乐池，伴奏使用的是吉他还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也许还有伴唱？但我没有听见。

她甩动黑裙、敲响靴跟，就在我的桌前跳着。何止毫无笑容，她简直神情严厉。那舞蹈里没有半点媚意，甚至毫无女性的温柔。说不清，究竟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还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舞蹈。她的舞蹈里有一丝不动声色的寂寞，可惜被豪华酒家的周末之夜压挤得似存似亡。

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弗拉门戈。虽然它与极富色彩的日本接踵而至，使我没能仔细留意它——但是，一点滋味和一丝印象，悄然潜入了我的记忆。此刻回忆着，封存的印象轻轻复苏了，那一夜箱根的细节次第涌出水面。

那是一个舞蹈的印象。是一个成熟的、舞蹈的、孤独的、拒绝的女性形象。愈是耽入回想，那黑裙的舞蹈愈是逼真。它给人，给满脑子的舞蹈概念以毁灭的冲击，须臾间便否定了关于舞蹈的旧说。没准儿，我想唯现代舞与它有些类似，但现代舞远不及它，黑色的它高踞一切之上，毫无现代舞那搜尽枯肠的本质。

有时舞步离我很近，跼跼的震动传入内心。黑色、中年、苗条、严厉——这魅力是特别的。那舞不是踢踏，却更富踢踏。显然穿的是硬底鞋，它敲击地板时，轻脆的节奏密集得夺人想象。

可是，尽管我为这异族情调的轻敲浅踏、对这种舞的跳法喜欢极了，但是我愈来愈明白了：吸引我的不是舞而是跳舞的人。

后来，2003年我在马德里看过一场真正的大型弗拉门戈，滋味神妙的《一千零一夜》。虽然那是一台极为精致的弗拉门戈舞台剧，而且那时我已经对弗拉门戈下过一番功夫；但我要说它带给我的——不及箱根印象。

娇嫩的演员们贬值了。因为她们亭亭玉立的身材里，不仅欠缺一丝韵味，还少了一种打击般的力量。身材的完美是先决的；但在这个条件之后，好像西班牙人更青睐舞者的年龄。也许，它就是要结合女性的美感和苍凉？我不知道。反正它散发的女性信号独特。若把她算作女性它就是魔女，先勾走人的魂魄，再给人警告和拒绝。我承认我没见识过这样的女性，她给人振聋发聩的感觉。但是她不给人一个机会，比如显露笑容的轮廓，绽开脸颊的肌理——所以没有谁能判断，她其深莫测。

就这样，在对她和我都是异国的日本，在一个休息的瞬间，我目击了一次弗拉门戈的表演。那独舞的西班牙女人皮肤黝黑粗糙，你并不怀疑她属于底层世界。她脸上如满是刀伤，棱角鲜明神情冷漠。她先以魔法的磁性吸引，再以高贵的质感否定。在她的舞蹈面前，茫茫盛装的食客，如粗俗饕餮的动物。

满堂都在享受，它在其中服务——但那一袭黑裙激烈闪烁，惟它傲慢，惟它至尊。

唉，那一夜的箱根！……

后来朋友问到我那时的细节，我却忘了是否有过音乐伴奏，也记不清她是否有舞伴。我不知舞蹈题目，甚至没记住——弗拉门戈这泛泛的名称。

我只记得那一夜，恍惚间我陷入了瞻仰的幻觉。解释不清的一丝崇敬，至今似乎还挂在脸上。就这么，我从日本古老的名胜，带回一个西班牙的印象。我带着对箱根的歉意说及此事，但日本人听了却洋洋得意。那时虽然我连它的名称都不知道，但是我却记住了它，并把它当作了我理解的弗拉门戈。

这就是我和它的初次邂逅。

## 2, cante (歌)

关于弗拉门戈的概念，以及那个黑裙印象，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打破了。已是初冬的11月。天气愈来愈冷了，既是旅人，就要加紧赶路。可是在这座古代穆斯林的文明之都，总觉得有什么事，还没有办完。

我们多少惆怅地，在科尔多瓦过着最后的几天。

围着今日成了天主教的主教堂、但名字却叫做 La Mezquita (清真寺) 的科尔多瓦大寺，人确实舍不得离开。但若是进一道清真寺的门就要花六个半欧元，又实在使穆斯林觉得太过分了。于是我们在那水渍斑驳的黄石头墙外散步，从外面欣赏这传为奇迹的建筑。这儿是安达卢西亚的深处，如果在这儿不能看到弗拉门戈，机会就剩下的不多了。弗拉门戈，它在自己的故乡，在浪漫的安达卢西亚、总不会和它屈辱地在日本为人佐餐助兴时、那么一副冷峻的脸色吧！

我不住地忆起那个黑裙女人。

见人便打听弗拉门戈。那些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的大汉们打量着我们，脸上堆着嘲笑，回答也不怀好意：

“Japonés (日本人吗)? 弗拉门戈? 去格拉纳达呀! 去阿尔巴辛背后，去圣山的吉普赛山洞呀! 弗拉门戈就在那儿，专门给日本人演出。旅游车可以开到旅馆接你，一个人只要三千五百比塞塔!”

我恨恨地咬着牙。

不但又把我们当日本人，而且对日本人的嘲讽也不公道。我知道他们说的山洞，那个地方在低劣的电视片里屡屡提及。做解说态的特约嘉宾活像妓院老板，在花哨的窑洞前侃侃而谈。他们哪里知道，脚下便是摩尔人起义的阿尔巴辛。顺着迤邐而上的那片荒凉山坡，就是今日以招徕日本顾客出名的萨戈罗蒙黛(圣山) (Sacromonte)。我们起码不想花那些钱，其次我们要弄明白这个古怪文化。可是，查遍各处也得不到消息，谁知道我们能与它推心置腹的弗拉门戈，究竟在哪里呢？

在格拉纳达的红宫脚下，顺着达罗河的路口，若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日本学生贴的小条——给同胞指示去萨戈罗蒙黛的路径，甚至价格。读着那些熟悉的娃娃字，我心里悄悄喊道：哪怕放弃不看，我也决不去那种骗人的山洞！

所以就要感激科尔多瓦的旅游局。我们说，别给我们介绍窑洞。我们想找到一个拜尼亚，和那里的人交流。拜尼亚 (peña) 是一种弗拉门戈的私人聚会场所，有些像小规模的行会。据说他们不做商业演出， peña 只供自己人交际和娱乐。

旅游局的那小伙子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事。我们已经失望地要走了，他却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西班牙的旅游信息接待非常发达。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你问哪儿有反政府游行他们都答得出来。而科尔多瓦旅游局自然因城市的特殊而更加熟门里手，如今回忆起来它简直就像阿里巴巴的门房。大概是听我们拜尼亚、拜尼亚讲的太内行了吧，或者就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大学生的、也全靠免费的古迹、画展、演唱、公园过日子；他翻着记录说：

别着急别着急，弗拉门戈……有一场！这是本城广播界的一项纪念活动，免费，在周末，地点在——

周末晚上，我们早早到了那个广播界的会场。

我抢先占据了第一排座位。离开始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到场，只有几个服务人员在忙碌。

小小的场所，很像一个大会议室。朴素简单，只摆着一排排折叠椅子。没有幕，没有音响，没有舞台，没有麦克风，没有风骚的主持人。但是开场之前人挤得满满，坐在第一排朝后看，看着满堂的观客我不禁得意。幸亏我们笨鸟先飞，早早地占了好位子。西班牙人打量我们的眼神里有一丝笑意，像是心会意领地说：我们的弗拉门戈当然是一流的。瞧，还没有传出消息，识货的日本人已经来了。

他们都认为，日本人是西班牙魅力的欣赏者。无论我怎么解释，反正没人相信中国人会喜欢弗拉门戈，哪怕我早到两小时占位子。但他们的脸上表情友善，他们满意有人能找到这里。

我憋住不露声色，分析这里的场地。若为了照相方便，还是坐得靠后些更好。趁着还有空位，我们挪到第五排，尽量坐得舒服，等着弗拉门戈的开始。

于是对弗拉门戈的概念就在科尔多瓦被打破了。

不是记忆中那垂目低眉、瘦削严峻的黑衣女人，这一回，随随便便走上前面两把折叠椅的，是两个男人。

高个的是一位长卷发的美男子，握着一柄吉他。那家伙确实长得英俊，铮铮地调试着手中吉他。可以理解他按耐不住的那股自梳羽毛的派头。漂亮不漂亮，看你一会儿的吉他，我想。

我已经预感到：黑裙子的女人不会出现了。

箱根的印象裂了缝。我面前的弗拉门戈，是完全别样的。幸亏急忙地补课，使我好歹懂了一些大原则——所谓现代的弗拉门戈，大体上由这么三部分组成：刚代（cante）、铎盖（toque）、巴依莱（baile）。也就是：歌、琴、舞。不是三者缺一不可，但“歌”排在第一位。

卷发的大个子吉他手开始调弦。也是后来我才懂得：这种吉他手非同小可。在弗拉门戈中，他的伴奏叫做 toque；给我讲的人强调：“铎盖”不仅只是伴奏而已，toque 是弗拉门戈的一部分。我暗想既然是乐器，又怎么不仅是伴奏呢？听不懂。吉他在他极长的手指拨弄下响起一串复杂和弦，场子里的人一阵鼓掌。难怪他锋芒毕露，我想。不仅人是美男子，而且角色本来也不只是帮手。

另一个则其貌不扬，是那种常见的，咖啡馆里端着杯子翻报纸的老头。他没有如吉他手那么打扮，穿着一件外套，没有系上扣子。他的表情有一丝局促，坐下前似乎有些紧张。如果不是后来我懂得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刚达翰尔（cantaor，歌手），若不是我后来才感到弗拉门戈的核心，不是不苟言笑的长裙窄袖的重踏轻旋，而是一支孤独嗓子的嘶喊——我是绝不敢相信的：他，一个随意的谁，居然就是弗拉门戈的主角。

开场也简单之极。

老头只是放下了杯子，望了一眼同伴。

一声粗哑的低声就这么响起来了。开始没有伴奏，这声音完全不是唱歌人的那一类。毫不优美，更无圆润，也没有什么逼人的男性气息。啞哑地唱了几句以后，吉他开始追它。歌者突然亮出本色，猛地拔高了声音，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镇慑了全场的空气。我的心被他扯着一下子紧张起来。急忙问歌词，他的词只有一两个。

啊，你死了……

妈妈！你死了

若是在其他另一个地方，也许这样唱会使人不以为然。但是奇异的是，他的歌词却直击人心。我发觉一股强烈的伤感正在自己胸中浮起。我压抑不住它，我发现全场的人都一样，他们被直露的喊声引诱着，也渐渐陷入了哀痛。这歌实在古怪，简直像一种咒语。我竭力分辨，心里反驳着。若是在北京你随意扯出死的话题，人们会把你笑话死。而这儿是科尔多瓦，这间屋子漂浮的气氛，鼓舞人唱出别处耻于开口的话。我突然联想到蒙古草原的古歌，那种歌也不能在北京唱；也是靠黑旧毡包和牛粪火，才能苏醒活泼的。

我再也没有……

像你的母亲……

不可思议的感觉攫住了我。它不是歌曲，我觉得他是在说话。这男人唱的不是歌曲，他只是寻机在这儿自言自语。一节悄然唱过了，铮铮的吉他声高扬起来。果然不仅是伴奏，那吉他的用意很明显；它也要唱，也要说——吉他手的十指飞速地如轮舞动，脆裂的金属声响成一道溪流。不是一个过门或间奏，是一大段吉他的诉说。我没见过吉他还有这么丰富的弹法，它简直有无限的语言和可能。原来这就是“铎盖”，人们醒来一般鼓起掌来。我被感染得兴奋莫名，也拼命地拍着手。就在这时“刚代”突然重新开始，一声撕碎了的吼叫脱颖而出，压住了热烈的 toque。

我求主给我死亡

他——却不给我

这是科尔多瓦的一个聚会，同业的伙伴在一起找个形式，纪念自己的过去。他们可真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在这样的歌唱中，什么都被纪念了。胸怀已经彻底敞开，心事已经释放出来，没有谁能再阻止它，只由任它如狂流肆意，倾泻奔腾而下。

唱得酣畅以后，那退休的歌手便把手打在胸上。他的这只手不是做手势，而是加入抒发。五个手指随着唱出的那个词，滑动、跌落、一分一分倾吐着不尽而来的心事。在最激烈处，五指剧烈地颤抖、那句歌随着在胸前画着轮形的手，步步跌落、一落三叠、直至心情倾倒净尽、吼叫也已经淋漓尽致。

后来我留意到，更多的弗拉门戈歌手，不用这种揉胸的激烈手势。他们一般是双手微合，随着唱句，手击打着轻碎的拍子——轻击拍点的姿势，大概是今日



弗拉门戈在台上的基本姿态。

一曲一曲地，时间流逝着。我意识到所有的歌都是哀伤的，甚至都以痛苦为主题。包括唱爱情的，也都是唱爱的难遇或夭亡。换句蒙古的归纳方式，都是“嘎修道”（gaxiū daō，苦歌）。这样一边冥想一边听着，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一种陌生的音乐，不知它在哪儿达到了彻底，这使音乐变得不同寻常。

顺着卡尔图哈的小路，走到松林之前  
我转身回头大喊：妈妈！……

颤抖眼皮的一个退休老人，他已在忘我之境。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他独自唱得坦心裂肺，倾倒衷肠。吉他追逐着他，时而成慢板，时而如骤雨。他的口型和吐字都夸张得超乎寻常，但是人们却信服地、亦步亦趋地随着他感动。这居然是在欧洲！……我感到恍惚，不断有跌入蒙古腹地、那深雪孤灯的幻觉。但他的歌不光是攫住了我，全场所有的人仿佛都被施了魔法，慢慢随着歌声晃动。那个箱根夜晚的女人渐渐黯然褪色了，此刻一个新的印象在上升。虽然后来我又长久地确认过，但我已经抱着新的观点：不是舞，不是琴，只有“刚代”才是弗拉门戈的主角，弗拉门戈的核心是一种悲歌。

几乎没有什么歌词。歌者和听众都不在意修辞，弗拉门戈的词汇，朴素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不如说只有这么一腔悲怨，在这种场合别的主题都消失了，人只诉说悲怨。歌手用手掌揉着胸，让它们吐出来时能顺畅些。

黑色的公牛……你吃草……  
是为了死亡……

好像这伤痛太古老了，它已经费尽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喊叫叹息。我慌乱中寻求着比较；但蒙古人诉说的“嘎修”（gaxiū，苦）是节制的，大致循着比兴对仗的格律。那些月黑之夜的围唱，循着一支支押着头韵、音节对仗的旧调。不像它，它是剖露直截的白话。比起它，我沉吟着掂量着：比起它来“嘎修”是短暂的。

那刚达斡尔的严肃神情，使我意识到他在遵循一种曲牌。您在按着谁教给您的唱法，您在唱着哪一种“刚代”，您的父亲或者爷爷在教给您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

任何的嘶喊，只要它成了歌，就一定会守着规矩，健全格律、曲调、唱法……注视着面前这平凡的老人，我在放纵自己的思路。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上了台。听介绍说，这人是歌手的弟弟。弟弟微笑着望着吉他，还没有开口。

不知道。没准儿，维吾尔人的刀郎围唱，与它更接近一些？

突然满场激动起来：原来这一回，兄弟两人都开口唱了。两股激烈应和、夺人心魄的呼喊攀援而起。

Pena, pena……（痛苦，痛苦……）

弟弟的声音在嘴中嚼着一般，愈来愈大地吐了出来。他一开口就使我感到，此刻听到的是弗拉门戈的最深处。一个词在嘴里颤抖着，挣跳着，冲出来时已带着俘掠全场的力量。哥哥已经先声夺人，成功地征服了全场，那么他就一定要这么唱。我觉的听众都意会了这句潜台词，暴风般的掌声猛地卷起。

grande pena..... (大的痛苦.....)

哥哥的声音追逐而至。他脸上微微有一丝羞涩。他的神情使我觉得，他是家族里或圈子里的首席。肯定在孩提时代开始，他就早早地获得了这样的传授。要如同把心撕碎一样地发声吐句，师傅或老人教给他，这是弗拉门戈的规矩。

两个声音夺路疾走，听着感到一种危险。它们撞击着屋顶，变成了回音，返回来夹击人的耳膜，压迫着听众不知所措的思路。汹涌的吉他如千军万马奔驰。这么听着，人们信了：“刚代”就是这样，弗拉门戈就是这样，因为痛苦太重，所以它这么坦白。我发觉自己紧握着拳头，手心沁出了汗。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我已忘我，被裹卷进去。在轰鸣中，两支嗓子都劈裂了，听不出他们是在唱，还是在哭。

究竟你们有过怎样的苦难？

——我几乎想喊出声来。

### 3, jondo (深)

就这样，我赶走了头脑里占据的、那个错误的弗拉门戈印象。一个新的形象，掳掠人心的“刚代”(cante)的形象取而代之，使我开始留意弗拉门戈这种——歌。

弗拉门戈有很多分类和术语。使我警醒的是，它也叫做 cante jondo (深歌)。它曾经被很多人注意过，如屡屡被人挂在嘴边的加西亚·洛尔卡 (García Lorca)，就在他的诗集中辑入了一部《深歌》。我至少已经见过两个有影响的中国诗人(北岛、余光中)写到洛尔卡，其中一个为了译出他的精髓，甚至学过西班牙文(余光中)。

在西班牙，加西亚·洛尔卡过分的著名，超出了人对诗人影响的理解。确实官方和民间都乐于承认他。无论是在剧场的广告牌、还是在薄薄的旅游书上，你会一再发现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无争议人物。这使我惊异。

为了理解消失的安达卢斯，我在安达卢西亚各地寻寻觅觅，不意也碰上了洛尔卡。去过他在格拉纳达 vega (湿地、平原)的家，也琢磨过他那些改写弗拉门戈的“深歌”。说实话，心里若是没有弗拉门戈与摩尔这么一个影子，我是不会加入对洛尔卡的讨论的，但偏偏洛尔卡在这一处下了功夫。

一目瞭然，身在格拉纳达 vega 的农家，他对弗拉门戈当然是近水楼台。但是，当年摩尔充斥的 vega 是否还给过他什么别的印记、他与那些弗拉门戈家族有过怎样的对话，就无从穷究了。我逐渐靠近了一种感觉：洛尔卡不仅是成功的弗拉门戈收集家，而且他多半属于一种弗拉门戈的“圈子”(peña)，我总觉得，并非名气使那些人接纳了他。他属于一种 peña，这才是原因。

有人说，他的功绩在于收集了一批重要的弗拉门戈歌词。但我没有读到。我可悲地不能广泛阅读他的原文，只是遇上中意的，就请教内行，追究西班牙文。如果他收集的弗拉门戈都混在他的《深歌集》里，那可就糟了，甄别剔除都将是极为麻烦的。

不过研究者多称《深歌集》是他的创作。当然，改写也是创作。我只想说，他的深歌在他的作品中异色异类，与他其余创作不可类比。这么说也许过份：“深歌”远远超出他别的诗，唯“深歌”才给了加西亚·洛尔卡以灵魂和地位。

但这些改作的深歌，远不能与原始的弗拉门戈深歌同日共语。一种匠人的技巧，把它们从民间艺术的“深”渊，拉到了诗的浅水。无论得到过怎样的喝彩——刻意的色彩涂填，制作的意境场景，无法与弗拉门戈天然的语言、无法和民间传承淘汰的结晶比拟。

我不是挑剔，甚至我因我的缘故喜爱加西亚·洛尔卡。但是作为读者有读的感觉；他很可能是拜尼亚中人，何况又有出色的才华。应该说，他有几首“深歌”对真正弗拉门戈的 cante jondo 描摹得异常逼真；但若说这几首诗就是惟妙惟肖、炉火纯青的弗拉门戈，则是胸无尺度。

如脍炙人口的《驮夫歌》，最是显露了作者的刻意，而没达到弗拉门戈的语言方式。“jaca negra, luna roja”（马儿黑，月亮红），恰恰是这简洁至极的色彩设计，暴露了诗人的雕琢痕迹。不仅黑红的着色，包括夜景、山路、赶马的驮夫——诗人的画面设计非常明显，虽然他用笔简洁：

Jaca negra, luna grande  
y aceitunas en mi alforja  
小黑马，大圆月  
橄榄就装在我的褡裢

不用说，洛尔卡的短句写出了诱人的夜路，但这种句子并不是弗拉门戈的语言。使这首诗脍炙人口的原因，在于它承袭了科尔多瓦古老的弗拉门戈悲剧感觉——而那悲剧深不可测，它其实不一定要用既黑又红的色彩来表现！

我是说，尽管它是一首好诗，但它并非地道的弗拉门戈。它取代不了弗拉门戈那种古老的、简单的、魔性的力量。模仿或改写弗拉门戈的《深歌》，在加西亚·洛尔卡的作品中是最闪亮的一部分。或者说，作为安达卢西亚的儿子，做为安达卢斯旧地的居民，他吮吸了潜在传统的滋养，取得了诗人的成功。不过，若以为成就他的唯有他的才华那就错了，恰恰这位儿子显得羸弱了些——对于伟大的安达卢西亚母亲而言。

还要怎样简炼，才能达到弗拉门戈的语言境界？

不，还不是一个简炼和火候的问题。完全的弗拉门戈语言，是不可能追求的。因为它完全不是为着表演和发表，而只是因为不堪痛苦。

痛苦并不一定表达得外露，甚至揉胸嘶吼，也未必没有分寸。日本人的体会途径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喜爱弗拉门戈的“寂”（さび）。

他们听出的，不仅是伤感也不仅是痛苦。很难说清他们归纳的“寂”的含义。但是在“铎盖”单调的音色中，在“刚代”拖长的哑声中，确实飘忽着日本人捕捉的“寂”。这种思路高人一等，所以也赢得了欧洲包括西班牙的注意。他们回报日本人的，是对“萨姆拉伊”（武士，samurai）和“改侠”（芸者，geixia）的感受。武士和艺妓，以及那个唯美的文化骨子中的一种“寂”，使最远之东方的日本人，接近了东方最西尽头的弗拉门戈。不过，我不知道，多少带着佛教味儿的“寂”，是否能准确地描述弗拉门戈。我想还该有更好的概念，它将不那么虚无，而是简单直截的。

“寂”的理解换回了好感，使这片风土对日本微开一缝。于是日本人相信，“寂”是通向理解的暗语。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苟同；我直觉地感到——不是文化的语言问题，而是历史的苦难问题。

曾有一个声音，曾有一个精灵，当它完全无意成为艺术的时候，它曾是境界

最高的艺术。弗拉门戈的拜尼亚（peña），既然它历史悠久，它一定就一路衍变而来。我怀疑它曾经是：当精灵还没有被认做艺术和商品时，它是——遭人歧视的家、舔干血迹的洞窟、哭喊上苍的场所。Peña 是它的遗迹，保留了它拒否外人的戒条。

这么判断的唯一根据，就是它那罕见的苦难主题。以蒙古苦歌（gaxiū daō）比较，它太沉重了，苦歌的旋律比它完整。虽然只是周而复始、重复循环的两句，但还是含有起承转合，用字也经过筛选。而弗拉门戈，虽然它也隐约呈双句的体裁，但是它不受格式的拘束。它唱出的是直截的东西——视觉，愿望。它的旋律就是喉咙和胸腔的抖动，就是吼喊的音频——这一点和新疆的刀郎围唱很像。不过，刀郎的那种艺术是宗教的，大家围坐成一个达依尔（圆圈），呼唤和赞美真主。

Pena, pena.....Dios mio  
痛苦.....痛苦.....我的主啊  
Tengo yo una grande pena  
我有一个巨大的痛苦.....

我听得目瞪口呆。难道歌能这样唱么？

我只是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打着哈欠走开。他们击掌合拍，为了唱出来一个飞速滑下的花音，彼此会意地庆贺。他们炫耀着技艺，用行云流水般的吉他铎盖，还有密集如雨的巴依莱的鞋跟声，度过节日般的时间。但他们在喊叫着苦难，奇怪的是，听众们都没有异议，都怀着同感，和他们一块感叹痛苦的真实。可能，这是世上最难解剖的音乐……

我总想摸到它的内心，听懂它的呼喊。我总觉得它在提醒人：别粗心，别离开，再多听一会儿。我向人请教，西班牙人摇摇头说：深歌就是那样。

“深歌”，究竟它深在哪里？

它不借助艺术手段，它只一吐满腔的积怨。洛尔卡身在格拉纳达，他与这些是否有过碰撞？他有过怎样的个人体验？专家们没有留意。世间往往如此：诗人死了，再也无害，于是人们便把他挂在嘴上，显示人性和博雅。对加西亚·洛尔卡的一致赞颂，或许也由于这个。谁都不会说：加西亚·洛尔卡最要紧的贡献，不在于他是一名好诗人和好剧作家、也不在于他收藏了和临摹了一些民歌；而在于他用现代诗的体裁，又一次重复了弗拉门戈对苦难的呼喊。

这个重复，也许是一件大事。

#### 4, peña（圈子）

后来我们又几次听过弗拉门戈；每次都多少有所感触，也都多少获得了那种幻觉。但是无论哪一次都取代不了科尔多瓦的印象。内行的人指点说，上一次你看的是 baile，这一次你见识的是 cante。以后，你还会遇到真正的 peña。

我们打听拜尼亚（peña）。

人们对这个词说得语焉不详。我大致听到了这样的印象：拜尼亚，是一种弗拉门戈艺者圈内的，艺术家自娱和交际的内部聚会。一般来说不相干的人是进入不了 peña 的；但是，如果你的运气好，他们一旦开门接受了你，那么你就能看到与商业演出截然不同的弗拉门戈。peña 哪里都有，他们常常在门上挂一个标

志。但是要注意，弗拉门戈的现状也和其它东西一样，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宰富骗人的赝品到处充斥着，很难遇到一处真的。

果然很难进入。去格拉纳达前曾有朋友拍胸脯，说给我们介绍。所以满以为会在一些拜尼亚里谈个水落石出呢，但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这样转到了加的斯。一天傍晚，正沿着海边散步，突然看见一栋房子，门上钉着一个蓝色小牌，写着peña。

敲了好一阵门，但没有回应。

这个词，对于我仍然是一个谜。究竟是这样一个词总结了一切内涵呢，抑或恰恰因为这个词，一些秘密的故事、一种深沉的本色被掩饰了？

对弗拉门戈的研究难以尽数。多少带有官方气味的书上说：它的渊源不易穷究。但可能它与印度的一脉，也就是与吉普赛人的艺术有着关系。但别的著作却反驳：为什么遍及欧洲的吉普赛人都没有这种东西，唯独西班牙、而且唯独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才有弗拉门戈呢？可见源头不在吉普赛，而在安达卢西亚。吉普赛人是到了安达卢西亚以后才濡染风习，学会并发展了弗拉门戈的。如下的观点大概是公允的：“安达卢西亚和吉普赛，是载着弗拉门戈的两个车轮。”

把吉普赛人说成弗拉门戈起源的观点，总使我觉得含有政治目的——若是德国荷兰起源说立不住脚，那就印度起源、哪怕中国起源也没关系。反正别让这块西班牙的招牌，又刨根刨到见鬼的阿拉伯那儿去。

这样的心理，潜伏在西班牙的弗拉门戈研究的水底。“吉普赛”、“印度”，这些说法给我的感觉，都有一种中性暧昧的味道。它先在弗拉门戈的东方特质上虚晃一枪，然后再甩开纠缠不已的阿拉伯文化。吉普赛至少还算基督徒，印度至少不是穆斯林——只是，如此煞费苦心的观点，遮掩不住西班牙的官方学术面对八百年安达卢斯穆斯林文明时的，那种深刻的自卑。

于是我开始想象。

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以想象为主、兼顾其它的下里巴人考证。

被我东拉西扯当做根据的，有一些因素就不多赘述了：比如弗拉门戈歌手演唱时的耸肩膀、拖长调。须知，前者的味道和维吾尔人的音乐表演如出一辙；后者则与蒙古草原的歌曲处理非常近似。再如家族性、小圈子，还有它的咏叹歌与北亚游牧民族在唱法上的相似，等等。

弗拉门戈一语的词源，也不容易弄清楚。

查着书，发现学者们在使劲把这个词说成一个天外来物，甚至猜它是一种鸟叫的拟音。我查得疲乏，渐渐觉得这种考证不怀好意。因为传统会留下古老的印迹，其中称谓就是一个深印。究明这个词的含义不该太难，难的无非是不能断言。里奥斯·鲁易斯（M.Rios Ruis）著《弗拉门戈入门》记录了明快的解释可能：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 felamengu，即“流浪者”一词的读音接近。日本人永川玲二新著《安达卢西亚风土记》支持这个倾向，把这个词解释成“逃奴”：“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逃亡奴隶一词的发音近似。”

阿拉伯语动词“逃亡”的词根 far-，确实可能派生出许多这一类词汇。不过，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以北，没有主张文化著作权的兴趣。所以对这一阿拉伯语词的判断，得不到他们的权威认识。虽然这个词汇提示着弗拉门戈可能与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悲剧有关，但就一种可能性而言，猜测只能到此为止。

当我听说，直至近代，弗拉门戈还只是一种家庭内部的、或者处于半地下状态的艺术——我便留意警惕了，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感觉。

为什么只在家族内部？为什么处于半地下状态？难道它传到吉普赛人手里以后，不就是为了公开和演出么？还有那主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这样一种几乎绝对的“苦歌”（gaxiū daō）？……

还有神秘的 peña，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后来被叫做拜尼亚。但它不是演出团体，是一个内部的圈子。什么算作内部的圈子？封闭的习惯，是因为伤痛不愿示人么？

我感到深深的兴趣。靠表演弗拉门戈出名的多是一些家族，也许这暗示着它的某种血统纠葛。这种内部传统吸引着我，我直觉，这不是为了给艺术保密。圈子，它会不会就是“半地下时代”的现代版呢？或者多少继承了那时秘密圈子的遗风？它的原型，古代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呢？

一种隐瞒自己排斥外界的、少数族众的圈子？如宗教组织、如秘密团体一样？

圈子里举行着秘密的仪礼？或者圈子干脆就为闭门大哭、捶胸顿足而设立？……

抑或都不是；它就是要诱人烦恼走火入魔，它就是要隐去真事取笑后人？或者它完全没有那么神秘，它不过是吉普赛的吉他手和刚达翰尔们一起喝喝咖啡、度过轻松时光的聚会？我提醒自己：愈是对它的重大内涵留意，就愈要注意它的完全相反的一面。或许不过如此：吉普赛人来到西班牙，创造了弗拉门戈。它异色异香，专门演给外人观看。Peña 正所谓三五成群，并无什么神秘可言……

——这么有言在先地写过，我就不用在为夸张自己的感觉而不安了。我已经把多数者的通说告诉了读者，留下的一点疑问只供自己咀嚼。

只是一种旧式的行帮呢？还是一种隐秘的仪式？

无论如何，摩尔人的音乐，包括吉他——曾把西班牙领上了一个高高的音乐台阶。先是奢华的装饰和绚丽的色彩，是女奴造成的诗歌风习，是科尔多瓦的巅峰感觉。后来，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走遍安达卢西亚几省，也找不到当年杏花如雪、女奴踏花吟诗的一丝痕迹了。如今在安达卢西亚能遇见的，只是“弗拉门戈”。它在莫名其妙地、空若无人地嘶吼。一句句地叠唱，单调得如同招魂。

Pena, pena.....Dios mio  
痛苦.....痛苦.....我的主啊  
Tengo yo una grande pena  
我有一个巨大的痛苦.....

虽然我不过只是猜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但我想，弗拉门戈的摩尔起源，将会被证明并非一种无稽之谈。逻辑还引导我进一步推测——它的圈子与摩尔人内部结构的关系、它的歌词与特殊念辞的关系。考据它的细部将会很费事，但推翻它的逻辑同样困难。我想，虽然还不能逐一实证，但提示已经足够醒目。

这些提示人人皆知；只是，人们大都喜欢遵循旧说，而不去反省自己的思路——过去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今天还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不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本来只打算写写对弗拉门戈的感受，结果却陷入了对它源头的纠缠。都是由于它那古怪的魅力，它揪扯着人不由自主。说实话我真是被它迷住了，甚至幻想——没准儿从这里出发，能探究到歌的某种本质。

## 第五部分 日本

### 《赤军的女儿》（节选）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四章

#### （四）

以“安田砦”（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被警察攻陷为分界线，后来的日本学生运动进入了低潮。

学生们戴着墨镜，拒绝上课，在“四叠半”的小屋恋人同居，哼着风靡七十年代的流行歌：《去结婚吧》和《神田川》。他们冷眼瞟着世间，各投其路，缅怀着过去，退出了舞台。

可是一些不服输的人，没有退出。

从学校坍塌的街垒，有一伙人一步就迈进了城市游击战，身份也骤然从学生变成了游击队员。炸弹攻击、袭击警察、毫无戏言的“战争”，突然取代了昨天半像节日的游行。

他们派别复杂，彼此莫名内讧。病毒般蔓延的，是分裂与残酷。他们渐渐地脱离了朋友、阵营和民众。他们用自制和夺来的炸弹，在日本实施了大约数十次、300余枚炸弹攻击。一时间日本四处狼烟，人心惶惶。在一个短暂但复杂的过程之后，左翼过激派的两支决定配合作战，史称连合赤军。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向两个方向分流。

其中一支，在山岳潜伏中，在灭顶的压力和精神崩溃中，居然以思想整肃的名义，杀害了十数名战友——罪孽的小队走投无路，最后笼城于浅间山的旅馆，主要用猎枪（有一支手枪）与警察对射一场，最后银铛入狱。

残害同伴的事实随之暴露。如此的罪孽一旦公之天下，日本全国、包括所有的左翼学生都不能容忍了！极左派的名声，一坠千丈。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他们做过的事，彼此是撕裂和对立的。援救贫弱的好意和极度变态的残忍，居然能孪生于一身！……

对革命的阴暗面，中国人并不生疏。但是，即便饱读和熟听红色之丑革命之恶的中国人，仍然会感到满心震惊：日本的极左派居然干出了——以殴打致死来对付同伴战友的整风！

——这个词，“総括”，该怎么翻译它呢？总结？！整风？！

二十年里，每当读到它的资料，我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我无力，也无心叙述这一部分。1993年在日本名古屋，我读着坂口宏的《浅间山庄》，心情痛苦无比。

后来一批赤军劫持了飞机，要求政府释放狱中战友。当日本政府决定答允劫机者的时候，死刑囚坂口宏拒绝出狱。

因为这是一次他本人对自己的判刑，除此他不能解脱。唯有对自己处以极刑，



才能抵销心头的重罪。

其实并非是政府、法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以及敌对的思潮打败了他们。打败、否定和抛弃了他们的，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初衷——左翼运动的人道主义起点。

在深山里，十数名同伴被活活打死——这件事使得整个抗议运动都安静了，使整个对军国主义的批判都沉默了。

难言的挫折感，陪伴着他们，也陪伴着我们。

一切都与我们有关。无论国籍怎样相异，中国革命是他们最初的教师。读着时心里如刀锋锯割，这是自己内里的爱恨交锋——它们撕咬不休、血流不止、使心成了一片血污泥泞！

即便掉头远走，也未必能获轻松。难道随着人说：红党天生性恶，本质就是法西斯，基因使它逃不脱内讧、权力欲和变态！？……去读日本的反思吧——有人分析：赤军的极端和暴力，源于日本的法西斯时代。

我哑然无语。

但是历史过程并非只是变态杀人，也不必急于做法西斯遗传的体检。在解剖最终在浅间山庄覆灭的那支罪过的小队时，也应该还有勇气、还有余墨，检讨他们的全貌。

——冒死盗走驻日美军的军火、用火瓶袭击美军飞机库、拦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首相，把炸弹投向美军目标、警察据点、老牌财阀，炸毁军国主义标志、袭击跨国公司……虽然只要炸弹一响辩护就难上加难，我还是想说：国家、警察、法律可以裁定他们的犯罪；而我们，中国人，难道有权站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上指责说——他们只有罪恶么？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在1971年12月12日，同时爆破了建在热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之碑”。

“兴亚观音像”是由指挥占领南京战役和南京大屠杀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惨遭屠戮的中国人的怨念、祈祷日华的融合一体、意在以一句佛号，抹消南京的罪行。

“殉国七士之碑”则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A级战犯的“墓碑”。

他们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判处绞刑的七名A级战犯（中国惯说甲级战犯）。七人分两批被处绞刑之后，七具遗骸被火化。占领军当局先宣布骨灰已撒入太平洋，但又在1955年交还了号称七战犯遗骨的白木箱。据说，除广田弘毅家拒绝认领外，其余几家都取回了遗骨。

但是另有一个说法在散布：据说七名A级战犯被处刑的时候，部分遗骨已被人从火葬场盗出，后日被右翼分子秘密安葬。这就是右翼的圣地、热海的“殉国七士墓”。

日美旧金山和约签字后，日本吉田内阁需要这一类宣传品。于是，首相吉田茂专为此碑挥毫，“殉国七士之碑”从兹公开面世，成了一处缅怀日本军国主义的名胜。

——轰然一声巨响，这座碑，连同南京大屠杀后保佑“兴亚”的观音菩萨像，都被“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被所谓极左派学生之“狼”，两处一块点火，一炮同时炸飞了！

他们的“恐怖”活动，还带有相当的学术味儿。

1972年10月23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同时炸掉了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以及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

雕塑“风雪之群像”。

原因是：他们认为，“北大”从它最初设立至今，一贯都是对阿伊努原住民进行侵略殖民的一线骨干养成所。其中所谓北方文化研究设施，不过是侵略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基地，也是掠夺阿伊努文化遗产的据点。“风雪之群像”，正是一个“日帝”殖民主义者对阿伊努征服战争结束、日本对阿伊努人完成了吞并同化的纪念碑。

1968年是明治政府设置北海道开拓使的一百周年。“狼”小组认为，殖民者宣扬“开道百年纪念”，乃是把对阿伊努人的殖民战争正当化、把归并和同化阿伊努人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行为。建于各地的纪念碑无非是宣扬这一意识形态和既成事实的手段，“风雪之群像”即其中之一。

旭川市常盘公园里的、由雕刻家本乡创作的“风雪之群像”，是一个阿伊努人原住民的老者，正给四个男女殖民者指路的造型。“狼”评论说：

“日本殖民者全都是站着的立像，阿伊努长老却是坐在树桩上。这个构图，明显是把日帝、道庁（北海道政府）、日本殖民者进行的对阿伊努土地的侵略正当化，宣扬阿伊努人对日本的屈服乃属当然，并且露骨地表示阿伊努人低日本人一头——这是一座侮辱性的雕塑。……面对这种阿伊努土地征服已经完成的‘既成事实’，阿伊努人并未沉默。围绕北方文化设施中最主要的、收夺阿伊努文化遗产问题（对阿伊努墓葬的盗掘等），阿伊努的抗议正在兴起。包括对这座‘风雪之群像’，阿伊努人也发动了阻止建造的反日斗争。”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狼小组”还有一件“恐怖行为”涉及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日本为1910年以来在朝鲜的殖民统治中死去的、日本无名殖民者和侵略者的约5000柱遗骨，于1965年在韩国首尔附近建设了一座合祀台。韩国人自合祀台立案就愤怒反对、建成后更以汽油焚烧、破坏台座碑面、发表抗议声明等手段反对。不得已，1971年日本政府把这5000柱遗骨运回日本，安置于总持寺的纳骨堂。

“狼小组”认为：这一行为，是把“日帝”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正当化、是把日本殖民者和侵略者的“反革命罪行”一笔勾销。于是第二年（1972）4月6日，他们炸掉了位于横浜的曹洞宗总持寺常照殿，即纳骨堂。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群狼干下的这些事，早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但有谁能根据一种道德原理，判决这些行为是“罪恶”呢？

不，我想叙述的，还不是他们。

我只想一笔把相关旧帐勾勒一过，只想快刀乱麻斩断粘连，只想让我的读者和我一起，快快跳出日本国外。

放弃这个话题——难道不是很容易么？为什么还不快些隐蔽，为什么还放纵冲动呢？但是我不能舍弃。早在1983年，我初次在东京遭逢了他们的时候就明白：我不能放弃。不能只为浅间山庄那伙人做的事，就轻易抹消真挚的日本左翼运动。

我不能背叛也不想掩饰我的感情。

我怀着希望，邀请读者一道观察——那些叫做“阿拉伯赤军”的年轻人。为什么你如此顽固？

我说：“只缘妖雾又重来”。我这样做，只是由于今天，世上不单正在硝烟滚滚地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十字军战争；而且还正锲而不舍地推行着一场解构革命的工程。

何止小小的日本赤军，被人百般咒骂的，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这场咒骂，终一个两个世纪不会终止。因为这工程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千年大计，是它们的深谋大略。

写着这一章的时候（2007），新的一批诬蔑毛泽东的书，正在全球包装火爆上市。说慌者宣称在发掘“真相”，就像凶手扮演着死者。那么残剩的我们的声音，就还是有益的。因为剔除和甄别，找出脚踏伟大意义的一部分历史，此刻更显出紧迫和重要。否则，若是只剩下了右派的叫嚣和侏儒的哲学，世界该多么寂寞！

人会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悲。

我却说，研究历史到了如此火候，也就没有了局外人的残忍和虚伪。

我想叙述的，是发生在日本国外的一段故事。不是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散乱的信息。关于一支走过与他们的国内盟友完全不同道路的、“阿拉伯赤军”的足迹，以及他们的一个女儿的消息。

## （五）

二十三年前，1971年2月28日、被同伴选为赤军派中央委员的女大学生重信房子，从羽田乘飞机前往贝鲁特，朋友和家人到机场为她送行。

当时已变身为游击队的左派学生理论，是“世界革命同时论”。毛泽东早期的井冈山、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都给他们方向的指引。苦于没有根据地的他们，甚至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联络员，想直接与共产党国家结盟。派往古巴的代表已经出发，只是没能见到卡斯特罗。

巴勒斯坦，这个响亮的名字和70年代世界正义的指针，给迷茫的他们指出了一条路。

重信房子怀着一个朦胧的目标，踏上了她的人生狭路。

她和京都大学工科学生奥平刚士做了结婚登记。这样她就能用写着夫姓奥平的护照出国。此时奥平刚士已先她一步，踏上了中东的土地。

他们投奔的，是以贝鲁特为据点活动的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

当日本国内发生了残杀战友事件时，他们受到了极大刺激。在重信房子的回忆录，以及岡本公三审讯记录中，都记载了他们愤怒地向国内赤军派宣布“诀别”、决心“率直地改正错误”、在巴勒斯坦走出一条新路的心情。

必须强调：这个起点，乃是阿拉伯赤军的本质。

这一诀别的意义在当时或许还不清晰，但唯因这一次分道扬镳，使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脱离了日本国内的是非，而与巴勒斯坦的解放系在了一起。

他们以此一步，赢得了一席有争议的历史地位。无疑争议会继续很久，但随着媒体帝国主义谎言体系的破败、和人类良知的起义爆发，日本的这一支阿拉伯赤军，将会赢得历史的尊敬。

这是后话。

当时，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组织，被以色列赶出了巴勒斯坦。他们为了生存和祖国，在黎巴嫩的难民营坚持武装斗争——这就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被“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称为恐怖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时代。

在那个时刻，日本学生万里来投，一支象征性的“阿拉伯赤军”，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怀抱里诞生了。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其中的意义何在？

结论已经在很久之前、还将在很久之后出现。

从1972年冬天开始，日本国内开始流传重信房子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战斗的你——来自阿拉伯的邀请信》：

“世界的斗争，已经徐徐化为一体。只要你拿着一张单程票走出来，那么我们就在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相遇。不管在哪里，朋友的天线，会发现陌生的你为了斗争，正渐渐地靠近我们。依仗战斗世界伙伴们的世界联系，在你出国后一个月左右，阿拉伯赤军会知道你的存在。

来吧，只手提着行装，走向未知的城镇，和我们一起开始战斗吧！在你一边劳动一面学习革命、等待机会的期间，伙伴们会送去战斗的邀请。大概在一年里，奔向哪儿都很简单，无钱旅行，会检验你的革命……

没钱就没法子在国外住——这是帝国主义心怀鬼胎的造谣。只要单程票和些许费用就足够了。……有亚洲人，也有欧洲和非洲人，就像从东京到大阪、从大阪到其它城市一样，世界在展开着胸怀。

事情原本是简单的。

等着你的到达，为了握手——”

1972年5月30日，日本刀从左边出鞘了。

三名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从罗马机场登上法航客机，抵达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里达国际机场。晚十点左右，他们出示了疫苗注射证明书，办好了入国手续，走进了候机大厅。三个人进入厕所，把伪造的护照撕毁并用水冲掉。然后回到大厅，从寄存行李中取出了冲锋枪和手榴弹。震惊世界的里达国际机场袭击开始了。在激烈的枪战中，一共死伤达98人之多，其中死亡26人，机场一片血光狼藉。

——但关于事件的细节，有不同的版本：

a，一般这个事件被称为“乱射”事件。官方发表的消息说，这是一次无区别（無差別）的乱射杀戮、是目标对准候机厅乘客的野蛮的恐怖行为；另一说则是，事情发生后，以色列军警立即开枪还击，死伤的人是在双方对射中成为牺牲的。

唯一幸存者岡本公三的发言是：那并非一次无差别乱射事件。他们的目标，是袭击机场的管制塔。

b，在枪战之后，三人中，奥平用手榴弹自爆，安田用身体盖住滚落的手榴弹被炸死。岡本公三冲出海关闯入机场里侧，用冲锋枪向以色列飞机扫射、并向停着的飞机投掷了手榴弹。最后他企图自爆杀身，但手榴弹故障未炸，再向跑道冲去时被抓住。

以色列官方发表说：奥平刚士和安田安之两人乃是被以色列军警击毙；岡本公三并未企图自杀，也是被以色列军警活捉。

岡本公三的法庭证言则说：安田投掷的手榴弹撞在墙上，落在了近前。为了不使一般乘客被卷入，安田扑在手榴弹上，被炸身亡。重信房子的女儿最近著书，也支持这一说法。（《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P. 54, 讲谈社）

没有参加行动的另一名原奇袭队员桧森孝雄，在30年之后，即2002年3月30日巴勒斯坦“土地日”当天，于东京日比谷公园烧身自杀，辞世于54岁。他留下的遗稿（《水平線の向こうに》、风尘社）仔细讲述了当年的袭击计划：阿

拉伯赤军计划攻击的目标，确是机场管制塔。

——甚至，由于担心在作战中会导致机场乘客的伤亡，还有一名参加者山田修曾经始终反对袭击管制塔。不久在游泳训练中，山田溺水而死。或许这不是一个事故，而是一个内心苦斗的结果。决意参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奇袭、又不能接受袭击机场的方案——在内心折磨和自我表白的撕扯尽头，人选择了自杀亦未可知。桧森孝雄正是为护送山田遗骨回日本，才未能参加行动。

最近（2006年），原阿拉伯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足立正生拍摄了一部电影《幽闭者》，半似荒唐半是实录地描写了这个震撼中东的事件。

这部古怪片子看似不经意地，留下一个细节：

两个袭击者已经牺牲。主人公抓出手榴弹、抱着它伏在地上——这个姿势有什么含义么？

影片手法怪异，让人难猜本意。

细节已很难追究。

只是，从针对细节的攻防中，能感到这一事件怎样地受到重视；能发觉包括细节在内，这是多么敏感的话题。

三个自杀攻击者都是大学生。

奥平刚士，1945年7月生于山口县下关。父亲是京都大学农学部的知识分子，小三岁的弟弟純三也是赤军成员。奥平是一个优等生，学习成绩经常保持前十名。1964年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同时参加“底层问题研究会”，在京都的贫民区开展服务活动。他在全共斗运动中崭露头角，由于演说形象英俊，据说大受女生们夸赞。1971年飞抵贝鲁特。约一年后，在特拉维夫机场事件中，以手榴弹自杀身亡。

奥平寄给父母的绝笔信如下：

久疏音讯了！现在正在罗马写着。也许这是最后一封信了。虽然出国后就定然不会再有生还，但是，不可思议地活至如今、和很多人相遇、懂得了很多事情、而且，走向最初思考的路——几遍想过，仍觉得都是值得感激的事。让我随心所欲、任性一场，无致礼的言词可表。……

待工作了结之后，再回到您们二位身旁。

祝健康。再见 刚士

——护身符小心藏着呢，和死去哥哥的照片一起。

安田安之，生于三重县。性格开朗，学习优秀，高中就读于名校四日市高校，三年级数学考试全县（相当中国的省）头名。父亲是高手木匠，梦想儿子能成为一流建筑师。所以他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主修建筑。68年京大运动时，他以无组织活动家的方式，积极参与。后来心醉于游击队思想，并和奥平刚士交往密切。1971年9月，对父母托言“为了学习建筑想到欧洲一转”，要来路费25万日元。母亲担心海外物价高，偷偷地又塞给他15万，他对母亲说：“谢谢，我会珍惜。”

父母看见儿子的容颜，是在特拉维夫事件后，政府在全日本公布照片、寻人认领的时候。据说三个人为隐藏身份，采用了《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干法，破坏面容。但后来以色列军警从厕所里找出了粉碎的假护照碎片，复原了安田的照片

并送交日本。

公布那天，据说全日本有十几个父母都声言“和我们家的孩子很像”，引起一阵骚乱。安田享年 26 岁。

电影《幽闭者》里，岡本公三被俘前的细节，或许也藏有什么意味：枪击已经结束，主人公掏出手榴弹。他紧紧抱着，咬牙闭眼，趴在地上。这个镜头暗示着毁容？暗示不伤及一般乘客？

镜头里，手榴弹被掏出的一瞬，引爆环脱落了，它在地板上一跳，不见了。

第三名，是唯一活下来的岡本公三。

岡本公三，1947 年生。鹿儿岛大学农学部学生，父亲是小学校长。那时，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领袖戈达尔用电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启发，赤军成员、电影导演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在 1971 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赤军·PFLP 世界战争宣言》，介绍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这部电影在鹿儿岛上演时，岡本公三曾参与协助。他于浅间山庄事件结束的次日、1971 年 2 月 29 日出国，并随即加入了“阿拉伯赤军”的行列。

主人公被俘后，受到了残忍的拷打，尤其受到药物注射。据电影导演足立正生以《幽闭者》进行的揭露——他被关进一个铁笼，被特意制造的噪声、滴水、饥渴、困倦轮番折磨。军警在他头上便溺，每番折磨完毕就把粗大的针头插入后颈，注射进不知名的药物。他发狂地喊叫：杀了我！让我死！但他无法死，只能忍受超绝常人想象的折磨、忍受摧毁他肉体与大脑的注射。

日本政府为了特拉维夫机场事件，曾派遣了陈谢特使前赴以色列，把佐藤首相的亲笔信转交给以色列总理梅耶。在日本，岡本的父亲则声色俱厉：“判我儿子死刑吧！”

以色列军事法庭最终判岡本公三终身监禁。

巴勒斯坦人民竭尽全力营救他。每一次旨在释放被捕战士的行动、包括著名的慕尼黑奥林匹克村袭击事件，都把释放岡本公三列入交换人质的名单，而且从不在这个立场让步。1985 年 5 月 20 日，在以色列监狱里坐牢的岡本公三，在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总司令部与以色列的俘虏交换中，获得了释放。他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回到贝鲁特和“阿拉伯赤军”的伙伴之中。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了对他的国际指名通缉。

在漫长的监禁中，岡本的精神已经疲惫。非人的折磨，摧残了肉体，他成了一个痴呆和衰老的病人。

特拉维夫机场事件发生的当夜，巴解阵线（PFLP）宣布对事件负责。阿拉伯人宣布：这次事件，是为了反击和报复以色列杀害两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行为、由 PFLP 组织的突击队实行的一次奇袭。因此，事件的硝烟尚未落尽，岡本和他的两名战友，已经被阿拉伯人民视为英雄。尤其岡本公三，在阿拉伯人中被称作“阿拉伯之星”，无人不知“Couzo”（コーゾー，公三）。

日本的赤军，在阿拉伯受到了承认。

这是一个民族的承认么？——因为审判中岡本曾宣言：“我们三人，死后将成为东方的三颗星。”

1997 年 2 月，日本政府向黎巴嫩派出了特使，要求引渡国际通缉中的岡本公三等五名日本赤军。但是贝鲁特和阿拉伯人民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仅有 400 万人口的黎巴嫩有 200 多名律师挺身而出，志愿为岡本辩护。紧接着，在 1999

年5月30日里达机场烈士牺牲纪念日，黎巴嫩年轻人们涌向贝鲁特沙迪拉地区的巴勒斯坦墓地，为奥平刚士和安田行之修建坟墓。

2000年3月，黎巴嫩政府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接受了被阿拉伯人民热烈拥戴的、岡本公三的政治避难。从此，岡本公三就在贝鲁特定居下来，一些来自日本和阿拉伯的年轻人守护着他。

一个呼吁建立援助岡本公三基金的网页，在2000年的夏天这样写道：

“在黎巴嫩，每年到了5月30日，人们都去给在里达机场斗争中倒下的日本赤军战士扫墓，召开集会。在火热的太阳下，大家割掉杂草，清洁坟墓。

今年的5·30，岡本公三也给奥平和安田扫墓来了！

所有的参加者，都一人一人地和岡本握手。拥挤着的人们有一点紧张，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Couzo Okamoto”(コーゾー・オカモト，岡本公三)。

直接和岡本见过面的黎巴嫩人，都因为紧张而显得姿势绷紧。我也重新实感了这位传说中的岡本公三，是怎样一位“阿拉伯的英雄”。扫墓结束后，大家朝着难民营往回走，沿途路上，老人们说着“岡本回来了”，都流着眼泪。……

黎巴嫩的年轻人，结成了“岡本公三及其同志的友人会”。他们表示，“不管出了什么事，也要保护（这些日本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日本赤军是为了我们拿起武器战斗的同志”，“虽然我们穷也没有钱，更没有地位，但保护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表示感谢时，他们甚至生气了。连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他们是为了阿拉伯斗争的、我们的同志！……”

有一个故事。

在日本赤军五个人被逮捕的时候（指1997年黎巴嫩政府在国际压力下逐出日本赤军，引者注），一下子来了200多个志愿者律师。有一个女律师布沙尔·阿尔·哈丽丽对我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岡本公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的攻击异常猛烈，因此，总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吞食阿拉伯的怪物”、是“不会崩垮的压顶大山”。

但是那以后发生了里达斗争。这一作战不是由阿拉伯人、而是由东洋来的日本人干的。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听见了巴勒斯坦的呼吁。

她说：“我第一次觉得以色列那么渺小”。因为那次作战，她被赋予了勇气，从那以后决心做一名律师。

在南黎巴嫩听说了日本赤军被捕的消息后，她径直赶到贝鲁特，参加了辩护。她就逮捕经过，严厉地质问总检察长。在以后的辩护中，她挑起了最深触及了日本赤军的政治性的辩论，强调日本赤军里达斗争的意义……

“阿拉伯赤军”发动的里达机场事件之后5週，1972年7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报复。以色列特务把炸弹安置在汽车上，杀害了要送侄子上学的巴勒斯坦诗人卡桑·卡纳法尼。据山口淑子即李香兰著《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参加卡纳法尼葬礼的人多达7万。在李香兰书中的插图里，卡纳法尼正在对她滔滔倾诉，背后的墙上，贴着毛泽东和格瓦拉的照片。他是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也是一个热情澎湃的诗人。

紧接着两週后，又一个邮件炸弹在卡桑·卡纳法尼的继任者、巴萨姆·阿布·谢里夫的手里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眼睛和几根手指。

人们说，报复的相酬是无休止的。那以后，悲剧不断循环，而且愈演愈烈。

慕尼黑奥林匹克人质事件不久也发生了，紧接着是以色列更大规模的报复。在核武器与石头块、导弹与步枪的悬殊对峙中，巴勒斯坦人渐渐被逼到了下风。再随着十字军战争升级和媒体的助纣为虐，我从戴着红领军的时候就听惯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陷入了绝望。

使用电影手段的原赤军成员足立正生，在他十年一剑的电影“幽闭者”片名上头，不顾摄制组反对，非要添上一行日文注音：“テロリスト”（，terrorist，恐怖主义者）。

据影评家四方田犬彦的诠释，影片作者在这个单词标音之上，表达了相当学究的观点。他说：这一称呼，这个恶谥，是在布什的战争中、专指谓战争的敌对方的。在巴勒斯坦没有这个词，巴勒斯坦人只使用“游击队”一语。影片要描写的，“是威胁着テロリスト——战争对方的、国家的无限制的暴力。影片以不点其名（因为谁都知道就是它们）的讽刺，揭发了某某和×××才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恐怖主义者。”

重信房子被捕后，在公审中说：“过去也好，今日也好，我都不是恐怖主义者”。她在2005年10月的法庭最终陈述中说“与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相联合，至今是我的骄傲。”检察方求刑无期徒刑，但被东京地方法庭否决，重信房子在2006年2月23日被判刑罚20年。

桧森孝雄的遗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侵略与屠杀、以及对人种歧视的抵抗。无论和平的或暴力的、无条件地支持为恢复人的尊严的抵抗。……”遗书的落款是：

在连接着巴勒斯坦的海边，2002 / 3 / 30 土地日，尤素福·桧森  
（《在水平线的对面》、p. 5-6）

尚不很清楚他们的宗教归属。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阿拉伯名字，而且在著作或遗书里郑重地使用这些名字称呼：尤素福·桧森、巴西姆·奥平、萨里哈·安田、瓦利德·山田……他们成为死者后都埋葬在贝鲁特的穆斯林墓地里，石碑上只用阿拉伯文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这一切，和一切的代价，至少增添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事件，是一次袭击更是一场呼喊。哪怕嘶哑难听，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声，是用日语喊出的。世界虽然吓得一阵哆嗦皱起眉毛，但世界已经不能假装没听见。无数人因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国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认识的一个深刻的注解。

同样，固执地要写这一节的我，也是为着这一点拿起了笔。巴勒斯坦问题并非人们在电视控制的年代，晚饭时瞟上一眼的佐餐谈资；更不是不觉间被谁灌输的、落后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条坏消息。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上纷争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变得硝烟滚滚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70年代之初、企图投身解决的这一顽疾固症，今天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议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军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仅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



顾名思义，阿拉伯赤军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亚洲母亲怀抱的一群日本儿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贝鲁特接受李香兰采访时，曾谈及一个“日本人不会为别国人去死”的问题。

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从阿拉伯换来了传奇、荣誉和贵重的好感，回赠给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绝这一回赠，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们；但日本必须正视——“阿拉伯赤军”代表的、“归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阿拉伯赤军以一种日本方式证实了这一可能，其慑人的力量，远非侏儒与党棍能否定。

——回顾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我只觉得羞愧无地。在他们的影子下，我唯觉自己的渺小。独自看那个电影的夜里，强烈的冲动撞击着胸膛。在标榜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无人传达他们的讯息。

责无旁贷，这是我的责任。他们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围咬。我不愿——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我要一吐为快，歌颂瞬间的光荣。我总算写出了这一篇。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这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担了罪恶感的齿咬。在那太激烈、太庞杂、太短暂的历史中，辉煌和阴暗、罪过和功绩，纠缠得难解难分。一切都属于他们，一切也都属于我们。

“阿拉伯赤军”——他们不过用犯规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极端的手段强调了公正。他们衣衫上满溅的血污，使人忽视了他们捍卫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来、企图把革命诬蔑为一种恶魔疯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国主义宣传之前，它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例子。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

从桦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历史审视、能俯瞰侏儒的世论、能使追求正义的人敬服、并成为他们人生参照的，或许只有“阿拉伯赤军”这一页。

这一页平衡了厚厚的一本。

## （六）

那么，对思想贫穷的我们来说，还有什么遗产可言呢？

不尽的悲剧一直在说：激进的革命思潮，只能导致非合法、暴力、炸弹，它是一条无望的绝路。所以，抗议和反体制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谁再为革命辩护。已经很久没有清新的词汇诞生，刷新世上流行的、贫乏的话语了。

何况——整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鲁迅讲过一种微妙的心理和思路：革命的伙伴派他去暗杀，他不习惯，也不愿意。结果，没有去就回来了。

一个选择的黑影，悄然但严峻地隐现在前。虽然形形色色的行人过客，终其一生，都未曾与这样的大命题相遇。

鲁迅说的是最深的心底话。他最初曾把这种心情向增田涉透露，后来又对许广平讲过：他不喜欢刺杀之类的手段。虽然他一生都为反叛和异端辩护，但他坦白：他不喜欢那样的方式。

究竟是否存在——以“和平”为手段执行的“正义”呢？和平主义的、非暴力和拒绝流血的道路，它存在么？究竟为什么，和平与正义这对孪生的姐妹，却像是相悖的分歧？

在这样的思路上苦苦寻索，就会与另一些日本人相遇：比如记者本多胜一，比如影星李香兰。

## 1 .

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更雄辩的是李香兰。

被想象成嗩声唱着靡靡之音的、满州国电影明星李香兰，怎能和极左派恐怖分子岡本公三、还有重信房子扯到一起呢？

谁敢相信：正是李香兰，曾经首先推动了日本的良知，在七十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

李香兰（她的日本名字叫山口淑子）在那个时代担任电视主持人。几乎与日本的阿拉伯赤军同时，她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并进行了对巴勒斯坦的采访。归国后，写了一本《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最近，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中，再次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为“阿拉伯赤军”表示同情和辩护。（《誰も書かなかったアラブ》、1974年，产经新闻社，《李香蘭を生きて》、2004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社）

读着这两本书，心头的感动是异样的。感觉居然和读着赤军的史料一样。这昔日大红大紫的明星，用娓娓的女性语气，毫不迟疑地呼应了——站在被杀戮者的一侧、推动世界公正的观点。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扉页上，印着一帧她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照片说明写的是：

“阿拉伯游击队的特拉维夫机场袭击事件后访问贝鲁特难民营。一个女人塞给我这个婴儿说：这个孩子送给你了，盼你把他培养成岡本公三一样的勇士！”

后来，她又在自传《生于李香兰》的开头，更详细地写到这件事。

在贝鲁特的难民营里，一个老太婆抱着一个男婴走向她，嘴里不停地讲着听不懂的阿拉伯语。翻译迟疑地用英语转译着，好不容易才弄懂，原来那阿拉伯老太婆是在说：

“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能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生于李香兰》P. 11）

那一次，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特别给她留下了亲切的印象。卡纳法尼甚至给她起了一个阿拉伯语的名字：加米拉（Jamila），这个词的意思

是“美丽”。

李香兰喜欢也珍视这个名字，所以把它当做自传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她用这个名字做题目，来纪念不久后就遭以色列暗杀的、那个优雅的诗人。

当然，李香兰对巴解人民阵线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最好的追悼，是她在这本明星自传里准确传达的、卡纳法尼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基本观点：

“巴勒斯坦人斗争，是为了回到家乡巴勒斯坦。……

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经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

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教给孩子们：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

（《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P.168-169

也许用岡本公三的例子，已经不能说服饱受美国式洗脑的朋友们。李香兰的例子，是否会多一些说服力呢？

其实无论谁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们的立场，其实只显露了自己做为人的质地而已。

……

（中略）

——圈子虽然绕得太大，但已经绕回了起点。

其中交叉着那么多人的轨迹：桦美智子、重信房子、岡本公三、李香兰、本多胜一。此刻——那个时代的儿女，有名和无名的、逝去的和生存的，都从往事中、从书籍中，默默地起身，向着我们走来。

比起不少诺贝尔奖和媒体炮制的人物，他们更真实、更具备意义。而且，也更有人情味。他们是一些无形的碑石，埋在路口，当残暴横行时，当谎言肆虐时，他们会显现出来，挡住强暴，给和平以救援。

在这血肉之躯围起的圈子中央，矗立着一面写着“和平”的旗帜。

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如日本。它有一部美国占领军替它制定的宪法，但正是美国，今天竭力怂恿它违宪、修宪、毁弃这部宪法。

而日本民众的一切奋争，不论是过激的还是理性的、不论是群众的运动或是孤胆的努力，都是对宪法九条的防卫。日本宪法因染上的淋漓鲜血，完成了它的奇异质变，如矿石在烈火中炼成了金。它早已蜕尽了底色，荡涤了美国占领军的涂抹，变成了一种世界的追求。

哪怕有一天九条离开宪法，日本已不可能后退到昔日。未来日本民族的体质中，将会活着一个灵魂。它是由那些著名和无名的战士以鲜血浇灌的、新的民族之魂。

它像墓地中的一座纪念碑，像雨林簇拥的一株千年松。这是日本曾有过的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形象，是亚洲和世界高举双手欢呼的日本象征。染血的“和平”在残破的旗子上呼呼作响。九条或许会成为历史，但是象征将会永存。

它已经是新的日本文明的基础。

我头一次感到了它的份量。九条，和平，回想起那么多次长期居留日本，我

从未仔细思索过它。

如今，在直面着新的帝国主义进攻的今日，我终于感到它如一股新鲜的血液，也流进了我的身体。我不仅能向日本、也能向美国和一切强国、向我的祖国尖锐地提问：

在中国，会产生这样的理念么？中国人会做出绝对的不战允诺么？会用宪法约束对和平的守卫么？

我们敢于挑战傲慢的大中华思想、并以法律禁止未来可能的、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威胁么？

我紧张而兴奋。

所以人们常说，和平宪法早超越了日本，它已是进步人类的一致愿望。围绕九条的沧桑已提示人类：社会的最好契约，必须是一切国家都盟誓允诺、放弃战争这貌似神圣的“主权”。

事不关己的时代就要结束，历史已经强求中国思考。

是的，在日本的启发下，我们也开始摸索——让自己的祖国、尤其当她钱包鼓满船坚炮利之后，也做彻底的不战承诺。让我们在修改了百年仍是草案的宪法上，在它庄严的共和国条款中，也表达如上的精神。

它会刺伤大中华的虚荣么？它会破了泱泱大国的面子吗？不，那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象征，那才是大国的风范景象。

无论历史将怎样演出，早晚中国要走到这一关口。是的，如果我们能推动自己的祖国抵达那样的繁荣，就连逝去的日本同志，也将得到安慰。

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令人陶醉的理想。

## （七）

让我找到一个焦点，结束最后的段落。

——阿拉伯赤军的负责人重信房子在阿拉伯生活了二十八、九年。她与一名巴勒斯坦战士之间，生下了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日本女性和阿拉伯人的女儿！我想着只觉光芒眩目。

是的，他们不仅留下了足迹，还留下了女儿。赤军的女儿，这个朦胧的形象，使我浮想翩翩。她似乎能淡化一切沉重，包括血腥和歧路，如一个天使或幻梦。也许，这梦一般的女儿，能成为我沉重话题的结尾？

听见我多次重复，不断念叨赤军的女儿，有人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心思，可以设法让你见到重信 Mei。

我说不，你错了。我不需要见她本人。因为我更愿这“赤军的女儿”，继续留在想象里，成为一个神秘的憧憬。

2001年4月3日、重信房子的女儿、28岁的重信 Mei（メイ，命）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应了一个算命的阿拉伯老奶奶给她的预言：在那一年里，人生会有大变。

既然已经被捕，也就结束了潜伏的状态。母亲决心让女儿恢复国籍。她在拘留所写了一本上交日本法务局的申诉书，这就是题为《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的重信房子自述。

经过了复杂的手续和 DNA 鉴定，从出生以来 28 年无国籍、隐姓埋名、扮做

一个黎巴嫩女孩长大的“命”，终于恢复了日本国籍。于是，恐怖组织的领袖母亲虽在坐牢，潜行异国的女儿却合法地回到了日本社会。

一个从小就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长大的女孩、一个能讲阿拉伯语、日语、英语、法语四种语言的天才、一个贝鲁特美国大学硕士和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博士、一个显然对世界有话要说的、潜在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日本左翼运动的年轻漂亮的女发言人——沉着地走进日本，露出迷人的微笑。

重信 Mei 名字的汉字，是“命”（メイ，Mei）。母亲解释说，是为了纪念革命、牺牲同志的生命、危险中的命。但她一般不用汉字而用日文メイ表示名字，为阅读方便，我采用“重信 Mei”的写法。

我不愿让她具象化，没去刻意寻找她的消息。我只仔细读了一本她写的自传，《秘密——从巴勒斯坦到樱花之国》，以及一篇她与人讨论一部库尔德题材电影的文章。

由于生得漂亮，打开电脑，甚至能找到她的粉丝网。

她的政治色彩如何？

谦和回避的日本人很少议论。无疑她不会重走母亲的狭路。世界已展开在她的面前，道路唯有她自己才能挑选。好像她也正表演着这谜语般的角色，熟练而轻灵。

当然，尽管她还没有拿出本色，重信 Mei 已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解说者。到处都有人请她去举办讲座，做巴勒斯坦专题的讲演。

母亲在没有桌子的监狱里写下的回忆录，记载了她的降生。为重信房子接生的贝鲁特一家医院，在母女出院的时候，坚决拒绝收费。医生激动地说：

“要道谢的是我们。我们一直为只能说一句谢谢，感到心里难受。不管怎样请别付什么钱！……我也是巴勒斯坦人。光荣的为我们民族斗争的日本人，能来我的医院让我高兴。……祝贺你顺利出产，然后再感谢你；为巴勒斯坦，为阿拉伯。而且我相信还应该说，为日本人民。愿真主给你女儿保护，她是我们医院的骄傲。起名字了吗？（重信房子回答：名叫命，Mei，阿拉伯语的 Hayāt，哈娅苔）祝贺你，Mei·哈娅苔！平安赐予你，真主保佑你！”

（《在苹果树下决定生下你》，幻冬舍，2001年，P136-137）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代新人的她们已经诞生。世界已转交到了她们的手上。她们是健康的、多民族结合的产物，天生就否决了种族主义。她们自孩提时代无家可归，所以她们的梦想，只有家园。她们最热爱的，唯有和平。

谁是赤军的女儿？

Mei-Hayāt？

我只知道，一次新的革命已经启动。也许和过去的革命有了巨大的差异，也许暴力和流血已被摈除。但是，捍卫和平的终极目标不会变，援救弱者的冲动不会变、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正义不会变。

赤军的女儿。

美好的梦想。

——她将继承我们的灵魂、刷新我们的时代、跨越我们的悲剧。

她将在新的世纪，迎来世界的新生。

2008. 9. 27, Al-Gadr

## 短诗十八首

木寻

渡口

他在虚弱和衰老。这是你无法阻止的事情。因为你同样如此。  
时间有它的走向，当它在我们体内途经或逗留，当它驻足，  
有时它甚至令我们厌烦。然而一切的开始都被限定了结局。  
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你又看到那群飞鸟，一个雨后的清晨，它们永远在你的  
斜上方。  
幻觉与现实的分界线于是不再分明。

冬天

下雪了，妈妈  
秋天还将干燥的记忆  
保存  
像你收留 我的手  
弥补眼睛  
失落的颜色

距离

暮色挤满街边行人往来的路口，我们早已松弛。  
解除了绳索，眼睛跟随街灯一盏一盏亮起，  
人的声音跟着窗子打开又关闭，花也这样醒来并望着。

语无伦次的尽头是沉默，我们被失望豢养，  
从开始到结束，从百分百的纯度到达记忆的零点，  
血液的成分发生了几次明显变化？

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你松开我的手，  
时间合拢它的掌心，风景退回黑暗中。

梦里：光线和色彩都将以崭新的方式  
回到我们最初相遇的路上。

## 延长线

总有泪水踩着 枯黄和落叶  
总有微笑在风中 为危险和愉悦喝彩  
总有人等待你 从清晨到夜晚  
一种沉默如何 走得这样快

## 恋

蝴蝶死了  
大海陨落  
最后一颗明亮的星  
他将要离开，被预支的  
才华和敏感，无法在深夜成为港湾

很多次我把一天当成了一生  
擦亮镜子，水滴宁静

灯将萎熄  
最后的帘幕步入舞池  
终于只剩下了我们  
再没有多余的钥匙，打开陌生的门

## 二月

神鸟衔来天空，覆盖着河流。  
地狱只有一种季节、一张脸孔。  
发一种光。  
看不见的人，说那是黑色。  
我听到摩擦手掌的声音，不下雨的城市，昨夜的雪堆在今天的门边。  
走出去，就可以触摸和唤醒，那个失去的夜晚。

## 第一次

既有左手，又有右手  
有诚实，也有谎言  
但如何区分，当日光强烈  
被射穿的黑暗  
慢慢下沉，缀满胸腔

第一次置身涡流



第一次  
模仿失忆者 呼出灵魂

第一次 在失去之后被我拥有

## 所有

风把所有白天  
吹成夜晚，林木吸收了所有光线  
所有有你的房间  
我悄悄保留了一些  
温暖

## 港口

姐姐，天空用一枚钉子  
钉住了白天、夜晚

在冬天，结冰的不是伤口  
除了对坐的人  
生根的裂痕将往事越拉越远

相信智商如同谎言  
相信一个陌生港口，停留着  
归乡的船

载我一程姐姐  
哪怕最后一次相信和到达

## 那里

等雨的人，那里  
有时下雪  
那里有时上演与你与我无关的戏  
那里有时坐着想你的夜  
或像你的我

并不擅长铺叙明媚清晨  
与四月郊游

那里有时，黑漆漆双目失明房间

空气涨破了喉咙，一阵嘶哑的晕眩那里  
水龙头充满  
淋漓的血

那里，可栽培的树，不会深夜醒来  
爬向黎明的岸

## 远行

打碎镜子，痛  
仍旧存在。

有时，这是一种递进的关系。  
你关系着我，你呼吸的频率直接影响我  
甚至是看待事物的  
方式。

更多时候，岁月比你更早到来，我在紧闭的夜色中独坐，等待你从黑暗中递来——

也许是第一次被发明的音符，旋律的末尾，是那次梦中的远行。

## 什么

河流沉默  
在倾听和等待  
什么

牌楼矗立  
在隐藏和掩饰  
什么

台阶向下  
在延伸和铺展  
什么

你看着我  
在回答和诉说  
什么

“恐惧”

还需要多少坚硬  
才能将古旧的铜器

再次磨出锋芒

名字，  
而秘密在溶解，河流剧烈

镜中的危险  
和取阅孤独的人，同时打开房间

## 鼓楼

雾气在夜色中  
涨到了路的那一头

鸽子  
练习着飞：

从容转弯  
回不到从前  
收割掉荒凉的日子

我们是被种下的光明

## 渐渐消失的哀愁

没有一个事物能  
完整回忆  
没有一个晴天  
脱离了雨

没有一个祝福在手中变冷  
没有一个过渡在声音里  
停留，或成为灯盏

没有一张倜傥纸牌，说出你的名字  
和渐渐消失的哀愁

到来

如果还有一些花  
在这样的季节  
如果还有一些雨没有到来

如果石头在黄昏时  
体温没有变冷  
如果还有一些林木  
在瘢痕中生长

如果还有一些身体  
封存着芳香的血液  
如果还有人  
在离开自己的途中变老

如果还有一些白天  
此刻，在你身后  
没有变成夜晚

## 一天一夜

所有发光的物质终将消逝  
而黑暗，黑暗永存  
是你？  
保存了颤抖的火花  
当火焰终于平静  
一个人在一天之内第二次遇见自己

驱车前往那曾经被你反复离开的地方  
驱车前往 上午十点 有些记忆仍旧安眠于  
泥土。（那还是生命的起点）

昨夜我离开了家乡  
也许不会再回来  
在同样的地方  
跨过河流，城市有相同的早餐供应  
有丰富的夜晚  
交通信号灯 命我停留或是等待

而你在斑马线上行走  
你头发被风吹散的样子  
像我的从前

## 三生万物

你没有第三只眼睛  
你没有第三个鼻孔  
你没有第三片嘴唇  
你没有第三个耳朵  
你没有第三个手臂  
你没有第三条腿  
你没有第三只脚

数数你身体里到底多出了什么？  
数到三的请全部切除

## 蒋一谈小说集

### 地道战

每次填写个人简历，在出生地一栏，我会下意识地想到三个字：地道战。我的家乡在华北平原，我出生在那里，确切地说，出生在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下面藏着蜿蜒曲折的地道，相邻的村庄下面也有地道，这些地道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密集幽深的地道网。

谁也没有把村庄下面的这些地道全部走一遍，地道有多长，有多密集，村里最年长的老爷爷也不知道。上小学之前，我和小伙伴们在地道里面捉迷藏，玩打仗游戏，我们还在里面撒尿，拉屎，然后用土埋上。玩打仗的时候，谁都想当游击队员，没有人愿意扮演鬼子，可是没有了鬼子，打仗游戏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最后的结果常常是这样：我们七个人，五个人是游击队员，两个人是鬼子，游戏玩到一半，其中的一个鬼子还会中途叛变，他不想抱头承受密集的泥块，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的爷爷奶奶说过，当年他们就藏在这些地道里面，躲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也躲在里面，伺机用长矛捅鬼子，朝鬼子放冷枪。读小学之后，学校组织我们看《地道战》电影。那些地道真神奇啊，有那么多陷阱，还有暗道、防毒气门板，还能直接通到水井，拉住井绳飞身上去，给鬼子一个出其不意；还能从树上或者石磨里钻出来，给鬼子喂土地雷，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对我们说，我们村也是一个地道战村，一个英雄村！可是在学校的各个角落，我们没有看见过英雄的照片，或者画像。我们村里的英雄在哪儿呢？老师对我们说：“村里的那些地道，就是我们的英雄，中国的抗战英雄！”

我们依然有迷惑：村里的那几条地道，矮得直不起身，也没多少机关，虽然弯弯曲曲的，却没有多少神秘感，怎么和电影里的那些地道不一样呢？老师笑了，说：“你们小孩子玩的地道，是地道小分队，主要的地道早就被封起来了，咱们村很快会成为革命教育基地，会有很多人到咱们村参观，将来咱们村还会开发成旅游景点，地道战旅游景点！”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想去真正的地道里钻一钻、看一看。

这一天终于到了。城里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车一车的，到我们村里参观地道，还给我们学校送来了书包、铅笔和运动服。村里人聚集在老槐树下，说这么多年村里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到我们这里旅游观光，那些地道帮助我们村赚了不少钱。

学校的老师组织我们下过一次主地道。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地道的学生太多了，大家在地道里弓着身子，叽叽喳喳，汗臭味弥漫着，让人喘不过气，而且只能跟着老师往前走。我们一个挨着一个钻进去，一个挨着一个钻出来，迷迷糊糊的。出来之后，我听见有些同学说，里面热死了，臭死了，再也不想下去了。旁边的老师听见了，大声训斥了一番。我还在想，我们村里的地道为什么和电影里的地道不一样呢？电影里的地道，上下左右全是土，可是村里的地道墙面有些是土的，

有些是水泥砌成的，冷冰冰的，像个低矮的防空洞。

这是我少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后来，我去镇上读了中学，再后来我来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地道依然存在，我只是没有再下去过。这些年，我们那些小伙伴们——我们自称“七君子”——都在忙各自的事业，很少有机会集体相聚。今年初春，我和家里人通电话，父亲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小兵死了，三天前死的。”

“怎么回事？”

“小兵带客户参观地道，有一段地道突然塌方了。”

小兵在七君子中排行老五。我回到家乡，送别小兵。我们先前的七君子，来了三个，加上那个黑色骨灰盒，一共四个人。其余的三个人没能赶回来，我们都能理解。小兵的爷爷九十多岁了，拄着拐站在初春的雪地里，嘴巴紧闭，胡须飘拂胸前，神情非常孤独。

办完丧事，我们准备返程。小兵的爷爷说要请我们再坐一坐。我们以为，老人家想听一听小兵小时候的故事，我们也愿意共同分享。我们进屋坐下，老人家却走进里屋，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手里提着一杆红缨枪。我们站起身，意识到老人家可能要给我们忆苦思甜。

“坐，坐。”他点点头，让我们坐下，然后把红缨枪放在桌上，也在我们对面慢慢坐下了。这是真正的红缨枪，枪头是生铁铸成的，已经锈迹斑斑；红缨是黑褐色的，一缕一缕干结了；那根长木棍，好像是曲柳木，油光锃亮，摸起来滑溜溜的。

“好枪！”我说。

“枪头是我父亲打的。”老人家说。

我们轮流欣赏着这杆红缨枪。

“红缨是马毛做成的，尾巴上的毛，尾巴尖上的毛，又细又有韧劲，抽人抽得生疼。”老人家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你们也抽吧。”他把烟盒推给我们。他抽的烟两块钱一包，烟味冲鼻子，我们抽不惯，但还是每人取出了一根，各自点上。

“我今年九十一岁，”老人家突然睁大眼睛，提高声音说，“这杆红缨枪七十三岁了！”我们看着他，他的语气降了下来，“我十八岁有的它，挖地道那年有的它……”老人家有点激动，一不小心把嘴里的假牙吐到了地上。他捡起假牙，也不擦上面的土，直接放回嘴里，腮帮子鼓弄了好几下。

“地道……地道……”他喃喃自语。我们看着他，随后面面相觑。“在平地上挖地道不容易啊，挖出来的土那个多啊！”他摇了摇头，“那时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上阵了，土挖出来，就抬到村西头，越堆越高，堆成了一座山头……”老人家抽了一口烟，“咱们这儿是平原，没有山，我们就站在土山上放哨，拿着红缨枪放哨。”老人家颤巍巍站起来，拿起红缨枪，紧握手中，神情非常严肃，好像回到了当年。

我们在一旁听着、看着，忍不住说道：

“爷爷，这地道……真有那么厉害？”

“爷爷，说说当年的地道战吧。”

“我总觉得，藏地道里就是瓮中捉……人。”

“我一直想知道，地道战到底杀死了多少敌人，可就是查不到数据。”

“我也没查到。”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困惑，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老人家坐下来，重新点上

一根烟。我发现他的手指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

“你们……不相信地道战……是吗？”他的眼神扫过我们。

“相信。”

“我们相信，就是想知道更多。”

“爷爷，你给我们讲讲吧。”

他忽然激动起来：“看过《地道战》吗？”

我们一起点头。

“《地道战》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当年就是那样打鬼子打敌人的！”他语气急促，唾沫星子飞到空中。可是，看着他，我更加迷惑了。他似乎想证明什么，或者说，当提到地道战，提到当年的战斗岁月，他想表达的那些话语似乎已经根植在意识的最深处，让他完全相信那个电影故事，完全相信那就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不安。“地道……”他看着我们，喘了一口气，好像害怕我们马上离开，“唉……”他叹了口气，“没想到小兵会死在里面……”他的呼吸变沉重了。我们低下头。“我想给你们……讲一讲其他的事……”他说。我们满怀期待地望着他。

“我四十岁那年，咱们这儿一连下了两天的大雨，村里全是水，地道里全是水。村里人发现少了一男一女，怎么也找不着了，真是奇怪！大雨过后，村里的小孩在河边抓鱼，从地道口里漂出来一男一女的尸体，浑身光溜溜的，啥衣服也没穿，我们一看就明白了，他们在地道里搞破鞋，下大雨了，出不来了，淹死在里面了……”老人家沉浸在回忆之中，脸上的皱纹随着他的笑声堆在一起，眼睛发出异样的光亮。“那场大雨，基本上把地道废了，后来村里又组织我们挖土，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掏出来，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完全听入迷了。

“六十年代那场文革，斗啊，闹啊，打啊，我全经历了，”他越说越有兴致，我们坐在那儿，像最听话的学生。“村里有两派，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但相互之间不服气，邻村之间，武斗得更凶。我们是农民，不擅长写大字报、耍嘴皮子、玩笔杆子。我们开始武斗，在村里打，在庄稼地里打，后来钻进地道里打，好家伙，那真是地道战啊！”他越讲越兴奋了，“我那杆红缨枪真派上用场了……”他看了一眼桌上的红缨枪，眼神非常奇特，好像在凝视一位战友，“我告诉你们吧，我在地道里捅死过一个人，邻村的，我在地上打不过他，钻进了地道，他追过来。地道里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我钻到地道拐弯那儿停下来，拔下枪头，等着他过来。我听见他呼哧呼哧喘气，就举起枪头一气乱捅，也不知道捅了多少下，脑袋全懵了……他后来一动不动了……”老人家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我从另一个出口爬出去，跑到河边，把手上、脸上的血洗干净……”

我坐在那儿，脚底一开始是发热的，现在感觉到了寒冷。老人家摸着红缨枪的枪头，手臂在发颤。“我这辈子就杀死过一个人……我之前没对人讲过，对小兵也没讲过……今天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活不过今年了……”

“爷爷，你能活过一百岁！”

“肯定能！”

“爷爷，你身体硬朗着呢！”

他垂下眼帘，不接我们的话，好像压根儿没听见。“我想把红缨枪送给你们，你们是小兵的好兄弟……”他的声音更凝重了，“小兵死在地道里，这样也好……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报应……”老人家慢慢抬起眼睛，望向窗外，神色渐渐平静下来。



我们三个人，走出屋门，走到村里的那棵大槐树下面，在干瘪的树根上坐下来。三个人的情绪都有点茫然。

“红缨枪的穗黑成了这样，应该叫黑缨枪了。”

“红与黑，从来不分家。”

“谁收藏这杆枪？”

“剪刀、石头、布。”

“好！剪刀、石头、布！”

我们开始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心里一阵寒意。



## 伊夫·博纳富瓦诗选

陈力川 译

伊夫·博纳富瓦 (Yves Bonnefoy)，当代法国著名诗人。1923 年生于卢瓦尔河畔的图尔市。高中毕业后入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早年受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巴什拉尔的影响步入诗坛，1946 年开始发表诗作，1953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杜弗的动与静》，崭露头角。此后又陆续出版了诗集《昨日统治荒漠》、《刻字的石头》、《先于光的存在》、《在门槛的诱惑中》、《漂泊的生活》、《弯曲的船板》、《长锚链》、《当下时刻》等二十多部诗集，享誉文坛，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二种文字，数次荣获法国和国外的诗歌及文学大奖。1960 年后，博纳富瓦应邀在法国、瑞士和美国等多所大学讲学授课，被欧美的九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1981 年当选为法兰西公学教授，讲授比较诗学。美国艺术文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的称号。

博纳富瓦继承了波德莱尔、奈瓦尔，兰波、马拉美开启的法国现代诗传统，扬弃浪漫主义抒情和雄辩的诗风，忠实于诗人在词语以外获得的经验，使贴近真实的语言成为诗歌的主体。博纳富瓦的诗歌推崇形象，反对概念。他认为纯概念将词语与现实分开，使事物凝固，使语言干涸，而形象赋予思想以形体，故形象在人的头脑中远比纯粹的理念更有分量。他据此提出“在场”和“及物诗”的观点。“及物诗”就是人与物“在场”的地方。

博纳富瓦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批评家。他翻译过彼特拉克、莎士比亚、莱奥帕尔迪、叶芝等人的诗作和莎士比亚几乎所有重要的剧作。在文学艺术评论领域，他发表了《法国哥特时期的壁画》、《兰波自述》、《罗马，1630：早期巴洛克艺术的视野》、《他乡》、《贾克梅蒂作品评传》、《素描，色彩与光》、《戏剧与诗歌：莎士比亚与叶芝》、《在语言的地平线下》、《戈雅：黑色绘画》、《在波德莱尔的影响下》、《没有传奇的圣杯》等三十多部著作，还主编了《传统社会及古代世界的神话和宗教辞典》。

### 选自《刻字的石頭》(1965)

#### 焦慮和欲望的對話

—

我常常想像，在我的上方  
有一個做祭品的臉龐，它的容光  
如同一片被耕耘的田野。  
嘴唇和眼睛帶著微笑，  
額頭掛著憂傷，一個海一般的聲音低沉而令人厭倦。

我對它說：作我的力量吧，於是它越發明亮，  
俯視晨曦漸露的戰場  
和一條用蜿蜒曲折  
纏繞這片沃土的河流。

於是，我感到驚訝，何以要  
這麼久，這麼難。因為果實  
已掛滿樹枝。太陽  
已照亮夜的領土。  
我注視著我生命嚮往的高原，  
這隻手拉著另一隻嶙峋的手，  
缺席的呼吸托起  
未盡的秋天耕作的犁頭。

选自《先於光的存在》<sup>5</sup>（1987）

### 走近爐火旁

我走近爐火旁，大廳空空蕩蕩  
百葉窗緊閉，燈光熄滅，

我看到火還在燃燒，  
此刻正介於灰燼和火炭  
角力的平衡點上，  
火焰可隨心所欲，  
或猛烈或溫柔地擁抱  
被它引誘到  
散著香氣的樹枝和枯木床上的對象。  
那是昨天，我在夏日的驟雨中，  
拾回的帶角的樹枝，  
它像印度的一個神，  
帶著初戀的莊嚴  
看著愛他的女人  
被先於宇宙的雷電挾持。

明天我將攪動  
幾乎冷卻的火苗，這無疑將是  
一個夏日，就像天空將它  
賜予所有河流，世界的河流

---

<sup>5</sup> 根据博纳富瓦的解释，*Ce qui fut sans lumière*（直译为：无光的存在，意译为：“先于光的存在”）指的是曾经存在于意识中，但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写作使意识之光投向它们，将它们从未知的领域带到已知的领域。

和血的暗流。男人，女人，  
他們何時能及時明白，  
他們熾熱的情感或合或分？  
他們能否明智地預見  
在光的猶疑中  
幸福的叫喊變成焦慮的呻吟？

清晨的火，  
兩個熟睡的人的呼吸，  
一個人的手臂搭在另一個人的肩上。

而我來  
將大廳打開，迎接光明，  
我停下來，坐在那裡，看著你們，  
那純潔放鬆的四肢，  
時間因自己的富有而停止。

## 雲速

床，旁邊的窗玻璃，山谷，天空，  
美麗的雲速。  
窗玻璃上雨抓過的痕跡，瞬間，  
好像虛無在人世間的簽名。

在我昨日的夢中  
往年的穀粒燃燒，短促的火焰，  
在瓷磚地上，沒有熱量。  
我們赤裸的腳將它分開如清澈的水。

啊 我的朋友，  
我們身體之間的距離是何等微小！  
時間的劍刃，轉來轉去  
徒然尋找取勝的地方。

## 选自《彎曲的船板》(2001)

### 一塊石頭

我們不再有路，只有高聳的荒草，  
不再有涉水的淺灘，只有泥土，

不再有鋪好的床，只有  
影子和石頭通過我們擁抱。

然而夜色明亮  
如同我們希望的死亡。  
它使樹木發白，擴大。  
它們的葉子：沙子，泡沫。  
即使在時間以外天也會亮。

## 一塊石頭

他們活在詞語貧乏的時代，  
意義在鬆垮的節奏中不再跳動，  
煙霧擴散，包住火焰，  
他們擔心與快樂無緣。

他們睡去。懷著對世界的絕望。  
回憶來到他們的夢鄉，  
如同輕霧中的小船，照明燈  
加亮，駛向江的遠方。

他們醒來。然而草地已經變黑。  
影子是他們的麵包，風是他們的水，  
沉默，無明是他們的指環，  
雙臂抱緊的黑夜是他們在大地上僅有的火光。

## 在詞語的誘惑中

二

頃刻，  
猛然驚醒的時候，我可以  
講述，或嘗試講述  
爪子和笑聲的喧鬧，它們  
與貪婪，沒有歡樂的淺薄生活，  
在話語脫臼的邊緣相撞。  
我可以高聲宣佈在世界各處  
不公正和不幸正在蹂躪  
精神渴望賦予世界的意義，  
總之，我回憶存在的事物，  
只是絕望的清醒  
儘管纏繞在

阿爾米德<sup>6</sup>花園樹枝上的幻想  
對理性和夢具有同樣的誘惑，  
把詞語拋棄給信筆塗抹的人  
顯然是把真理中美的奉獻  
變成散文。

但是，對於我好像唯一真實的  
是希望的聲音，難道它  
對不承認它的法律全無意識。  
唯一真實的是手的顫抖，  
它觸摸到另一隻手的諾言，唯一真實的  
是在回來的路上，當夜色降臨，  
昏暗中推倒的屏障。  
我知道必須在書中劃掉的一切，  
然而剩下的一個字使我的嘴唇發燙。

啊 詩歌，  
我忍不住呼喚你的名字，  
那些今天在話語的廢墟中  
流浪的人不再喜歡的名字。  
我甘冒直接對你說話的風險，  
就像在雄辯的時代，  
人們於節日前夜，  
在大廳柱子的最高處，  
懸掛葉子和水果的花飾。

我這樣做，相信記憶  
通過向那些不顧晦澀難解，力求  
使意義存在的人傳授簡單的詞語，  
讓他們在記憶的斷章中辨認  
你唯一的和多樣的名字，在那裡  
他們懷疑和恐懼的枝蔓  
將靜靜地燃燒，一把清亮的火。  
“請看，記憶說，在唯一一本  
穿越世紀寫成的書中，請看  
在形象中成長的符號。遠方有  
發藍的群山，做你的大地。  
請聽音樂用巧妙的笛聲  
表達在萬物的頂端  
存在的音色。”

---

<sup>6</sup> 阿尔米德 (Armide, 意大利文 Armida) 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诗人塔索 (Tasso) 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是一个美丽的穆斯林巫师，其任务是在基督教十字军中制造不和。

啊 詩歌，  
我知道你被人否定和蔑視，  
人們認為你裝腔作勢，甚至把你當作謊言，  
指責你是語言的錯誤，  
說你給那些饑渴的人  
提供的水是不潔之物，  
讓他們失望，甚至死去。

不錯，夜晚使詞語膨脹，  
風捲殘頁，火勢減弱，  
受驚的牲畜跑到我們腳下。  
我們可曾相信在顯而易見中  
迷失的道路能把我們帶往遠方？  
不，畫面與上漲的水相撞擊，  
它們的結構缺乏條理，形同灰燼  
很快，連畫面，書也不復存在，  
世界上，也不再有了我們欲望的雙臂  
渴望擁抱的熱情的身體。

然而，我同樣知道  
除了你無名的小船，在這虛幻的星空，  
沒有其他恆星  
神秘地，預言式地，運動，  
但影子聚集在船頭，甚至歌唱  
就像從前遠行歸來的人，當  
泡沫環繞的大地，  
在他們面前變大，當燈塔閃閃發光。

如果留下  
不同於風，礁石，海的東西，  
我知道，即使在深夜，你將是  
拋下的錨和沙灘上蹣跚的腳步，  
你將是人們拾起的柴火和潮濕的  
樹枝下的火花，你將是在猶豫的火苗  
焦慮的等待中，  
長久沉默後的第一句話，  
在死去的世界下燃起的第一團火。

故居

十二

美與真實，在那倔強的呼聲上



起伏的大浪。如何在一片喧囂中  
聽見希望的聲音，  
如何做才能使衰老成為再生，  
使房門從內部打開，  
使死亡不再將尋求  
一個出生地的人拒之門外？

現在我明白了  
當有人敲門的時候，是刻瑞斯<sup>7</sup>  
在夜裡尋求庇護，外面  
一下子盡是她的美，她的光  
還有她的欲望，她暢飲  
希望之水的需要  
因為這或許是  
一個失而復得的孩子  
她儘管神聖而豐富，  
卻沒能將他在麥浪中托起  
使他無可爭辯的生命  
在死神的垂涎之前綻放笑容。

憐憫刻瑞斯吧，不要嘲笑她，  
相約在深夜的十字路口，  
透過字的呼喊，即使沒有回音，  
晦澀的話語，終能愛護  
因尋找而痛苦的刻瑞斯。

## 选自《長錨鏈》(2008)

“你好像是一個夜間行路的人……”<sup>8</sup>

他搖晃火把  
兩道光亮使在他身後

---

<sup>7</sup> 在罗马神话中，刻瑞斯（拉丁文：Ceres）是专司农业、丰收和繁殖力的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的得墨忒耳（Demeter）。传说她与朱比特（Jupiter）所生的女儿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a，希腊神话中的佩耳塞福涅，Persephone）被丘比特的兄弟冥王普卢同（Pluton）劫到冥界，成为冥后。刻瑞斯向朱比特求情，朱比特允许普罗塞耳皮娜一年中有六个月住在冥界，六个月回到她母亲身边。当普罗塞耳皮娜同母亲在一起时，大地万物回春，当她回到冥界时，大地万物凋零。人们以此解释一年四季的变化。

<sup>8</sup> 原诗的题目是意大利文：«**Facesti come quei che va di notte**...»，引自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二十二歌，三个诗人边走边谈：“你好像是一个夜间行路的人 / 把灯提在背后 / 不使自己受益 / 却使追随他的人们变得聪明。”

沿著深淵驅趕恐懼的人  
驚慌失措。

嚮導，為什麼在你身上，  
沒有你給他人的光芒？  
難道你沒有任何需要  
感知腳下的虛空？

這就是寓意的歸宿：  
言說者不能也不應知道  
他的語言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他的腳在虛空中尋找地面。  
遲疑的飛行在詞語中轉彎，  
灰燼中的夢多於火焰。

### 斯特凡·馬拉美之墓

他的帆就是他的墓，因為在這個  
地球上沒有任何微風能讓  
他聲音的小船  
對用波光呼喚他的江水說不。

他說，“太陽今晚落入烏雲”  
是雨果最美的詩句：  
那無以復加的水  
變成火，這火讓他著迷。

我們看到他在那裡，依稀難辨，  
在消失的船頭，搖動  
這裡的眼睛無法識別的東西。

難道死是這樣？他在對誰  
說話？夜幕降臨，他還剩下什麼？  
兩種顏色的披巾，攪動江水。

### 華茲華斯的童年記憶

就像，在《序曲》<sup>9</sup>中，這個  
進入光的下意識的孩子

---

<sup>9</sup> 《序曲》（The Prelude）是华兹华斯的自传体长诗，发表于1850年作者逝世之后。

突然發現一條小船，於是在天地之間，  
他走來，想把船劃向對岸。

可是他看到那邊越來越大、令人不安的  
一座黑色山峰，躲在群峰後面，  
他害怕了，折回蘆葦叢中  
那裡，卑微的生命在訴說永恆，

這個偉大的詩人本可以  
將其思想推向語言寧靜的時刻，  
並在其話語中得到救贖。

但是潮流，默默地，  
將他的詞語先於他帶往意識，  
他害怕超越自己的欲望。

选自《當下時刻》(2011)

### 低垂的樹枝

二

一片直達天邊的草原，  
一個唯一的思想，  
這裡命名他鄉，通過鶴的飛翔，  
我一心只顧回憶

泛起的當下，這是一個湧浪，  
廣袤的外界在言語中  
與組合的和分解的  
有意的和無意的言歸於好。

身著方格裙子的小姑娘，微笑著走來，  
一切的結局都將是  
詞語留在色彩上的皺褶。

用外國夏日的陽光，  
把自己包裹，  
身子抱緊詞語和它的影子。

